



CMF

China Macroeconomy Forum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第120期）

以贸易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

主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

2026年5月



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

第120期

以贸易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

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



以贸易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

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

第120期

报告人：王孝松
2026年5月30日

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
第120期

目 录

- 1 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
- 2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成绩和风险**
- 3 以贸易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不确定性**

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

-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
- 地缘政治博弈与战争冲突
- 大国竞争加剧不确定性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

截至目前，权威机构对全球2026年经济增速的预测已普遍下调。

- **IMF**（2026年4月）：假设中东冲突有限，预测2026年全球GDP增速为**3.1%**。但警告下行风险严峻，若冲突加剧或贸易脱钩深化，增速可能显著低于预测水平。
- **OECD**（2026年3月）：维持 **2.9%** 预测，但指出结构性减速——生产率低迷、债务高企、政策不确定性创数十年新高。
- **高盛**（2025年末）：预计**2.8%**，依赖美国减税与AI资本开支，但承认劳动力疲软与关税风险。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

- **世界银行**（2026年1月）：预测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6%**，指出2020年至2030年“或将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最疲软的十年”。
- **联合国**（2026年5月）：将全年增速下调至**2.5%**，预警能源供应中断、通胀回升（发达经济体2.9%、发展中经济体5.2%）及贸易萎缩（货物贸易增速仅为1.4% - 1.9%）。

地缘政治博弈冲击全球贸易体系

- 近年来，随着全球资源紧张和区域冲突加剧，地缘政治博弈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议题之一，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发展。
- 地缘政治冲突导致能源价格波动、供应链中断，进而影响全球经济发展。
- 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争导致全球能源格局从“经济、低碳”优先转向“安全、可靠”优先，各国调整能源政策以确保供应稳定。

地缘政治博弈冲击全球贸易体系

- 地缘冲突和紧张局势直接推高能源、运输成本，扰乱贸易航线，抑制企业和消费者信心，导致全球贸易增速明显放缓。
-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世贸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速将从2025年的4.7%大幅放缓至1.5%-2.5%，全球经济增速从2.9%回落至2.6%。
- 增速放缓的核心原因就是地缘政治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中东冲突还可能引发粮食、能源价格再次暴涨，高度依赖进口的发展中国家会面临更严峻的粮食安全和财政压力。

地缘政治博弈冲击全球贸易体系

- 地缘博弈冲击了多边贸易体系。
- 全球贸易中按最惠国待遇开展的贸易比重，已从2025年初的约80%下降到2026年初的约72%。
- 一方面各国密集出台关税、贸易限制措施，另一方面区域、双边贸易协定大量增加，区域贸易协定逐渐取代多边机制成为贸易规则的主要载体，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贸易规则的碎片化。

地缘政治博弈冲击全球贸易体系

- 截至目前，美伊冲突悬而未决，中东战争延宕导致能源“结构性断供”，各国调整能源策略以确保安全，全球能源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 中东地区不仅是传统能源产地，也是新能源矿产的潜在供应地，地缘博弈将进一步加剧。

地缘政治因素对贸易的影响

指标	2025年	2026年（预测）	变化趋势	主要驱动因素
全球商品贸易增速	4.7%	1.5%–2.5%	显著放缓	地缘冲突、供应链重组、政策不确定性
全球GDP增速	2.9%	2.6%	温和下行	投资延迟、消费疲软、能源成本高企
中美双边贸易增速	1.2%	0.5%–1.0%	持续低迷	出口管制、技术脱钩、市场替代
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年）	38	47	加速增长	阵营化规则构建、安全例外条款
最惠国待遇贸易占比	80%	72%	系统性下降	区域化规则替代多边框架

大国竞争加剧不确定性

- 中美竞争加剧正显著抬升全球不确定性，但尚未脱离“竞争中有管控、博弈中存交集”的基本框架。
- 经济与科技脱钩风险上升：美方持续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高端芯片、AI、量子等关键领域对华出口，并推动“友岸外包”；中方则强化产业链自主与RCEP、金砖等替代性机制，导致全球供应链碎片化、成本上升与创新协同受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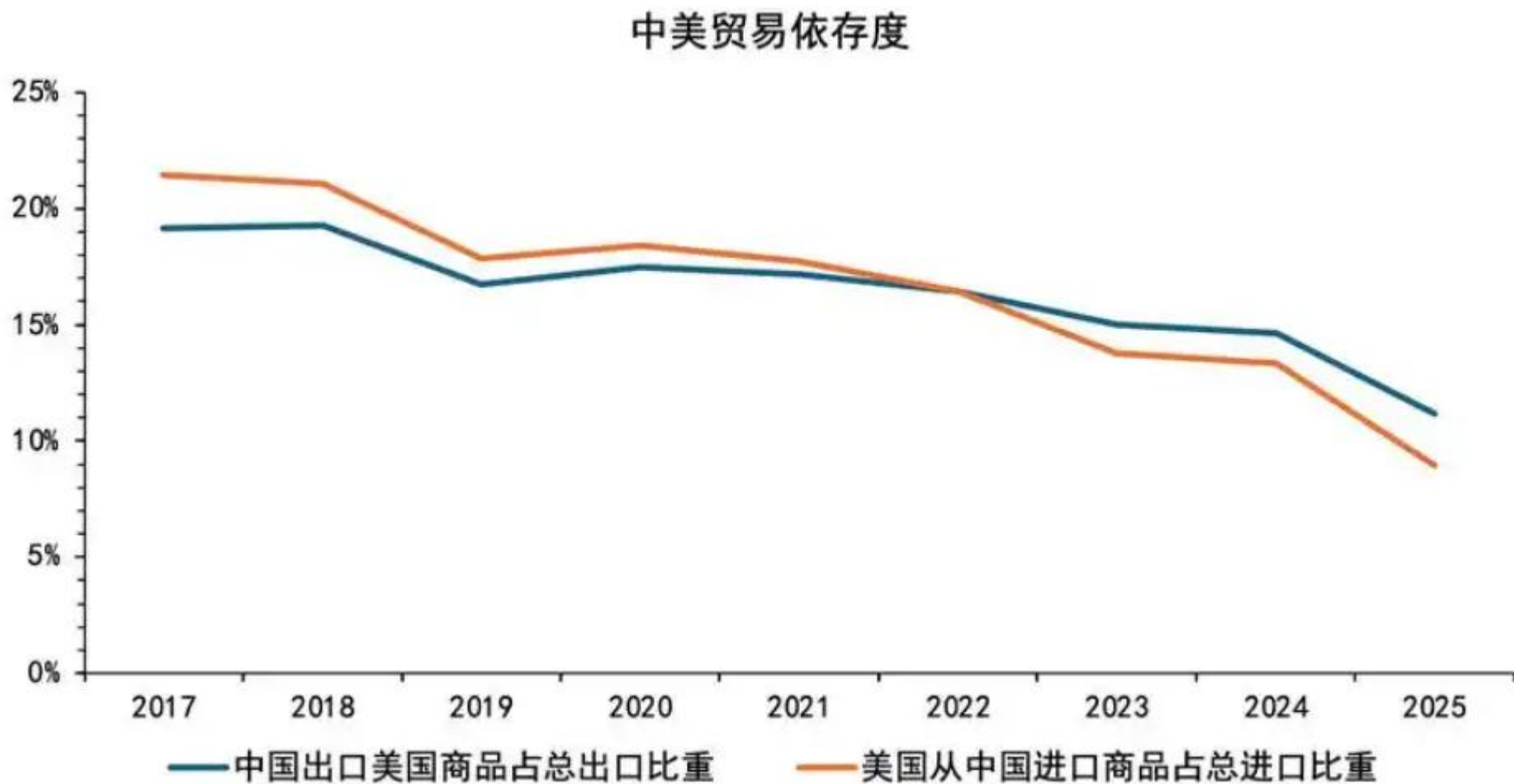
大国竞争加剧不确定性

- 地缘与台海敏感点频发：台湾、南海、科技标准主导权等议题易被国内政治工具化（尤其美国大选年）。近期元首级沟通暂时稳定大局，但执行层“小动作”不断，削弱政策连续性。
- 全球治理与市场信心承压：关税战、稀土管制、金融脱钩传闻加剧企业投资观望。
- 不确定性源于结构性而非临时性：美国将中国定调为“唯一既有意图又具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中国坚持发展权与安全底线，双方存在制度与发展模式竞争，管控机制薄弱、信任赤字高、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共同推高误判风险。

中美贸易依存度不断下降

- 近年来,中美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呈现不断下降态势。
- 2017年至2025年,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由19.1%下降至11.2%。
- 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占美国总进口的比重由21.4%下降至9%。

中美贸易依存度不断下降



美国“友岸外包”战略的效果

进口来源	2017年份额	2020年份额	2023年份额	2025年份额	变化幅度
中国大陆	21.4%	18.7%	11.5%	9.0%	下降12.4%
越南	1.8%	3.2%	4.8%	5.7%	上升3.9%
墨西哥	13.5%	14.1%	15.2%	15.8%	上升2.3%
中国台湾	4.1%	4.5%	7.1%	8.2%	上升4.1%
印度	1.2%	1.5%	2.1%	2.8%	上升1.6%
韩国	4.5%	4.3%	4.6%	4.9%	上升0.4%

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反噬”本质

产业领域	企业	项目地点	投资规模 (亿美元)	成本超支/挑战	关键效率指标	项目状态
半导体	台积电	亚利桑那州	1650	人力成本为台湾2-3倍，供应链依赖亚洲	毛利率8% (vs. 台湾62%)	2025年量产4nm，实现盈利，但盈利依赖补贴
半导体	三星	得克萨斯州	370+	建筑与劳动力成本飙升，项目延期	量产时间推迟至2026下半年	成本超支80亿美元，投产延迟
半导体	英特尔	俄亥俄州	1000	资金链紧张，战略方向摇摆	量产时间推迟至2030-2031年	变电站闲置，投资计划大幅放缓
新能源	LG新能源	密歇根州	>100	关键矿物依赖中国进口	电池组件本土化比例不足	为特斯拉供货，但上游供应链未脱钩
新能源	三星SDI	田纳西州	>100	劳动力短缺，技术转移困难	产能爬坡速度慢于预期	为特斯拉提供储能电池

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反噬”本质

- 美国“友岸外包”和“制造业回流”战略试图以政治意志重塑全球供应链，却未能充分正视市场规律对资本回报率、劳动力成本与基础设施承载力的刚性约束。
- “友岸外包”和“制造业回流”并非基于市场效率的自然选择，而是一场由巨额公共补贴驱动、以政治目标为导向的“资本注入”，将全球最先进的芯片制造产能“物理上”置于美国领土，但并未解决其在**成本结构、人才储备、供应链韧性和商业可持续性**上的根本性缺陷。
- 与此同时，给世界产业链供应链带来了巨大冲击，也使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强。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成绩和风险

- 今年前四个月贸易发展回顾
- 中国对外贸易韧性凸显
- 中国对外贸易的风险和挑战

2026年1-4月中国贸易发展回顾

- 进出口显著增长
- 保税物流蓬勃发展
- 民营企业的贸易地位持续提高
- 新质生产力推动贸易结构优化
-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
- 贸易伙伴多元化布局持续推进

进出口显著增长

以人民币计

1-4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上涨14.9%。

出口总值 9.33万亿 元人民币，同比去年 ↑ 11.3%

进口总值 6.90万亿 元人民币，同比去年 ↑ 20%

贸易顺差2.43万亿人民币，同比去年 ↑ 11.3%

以美元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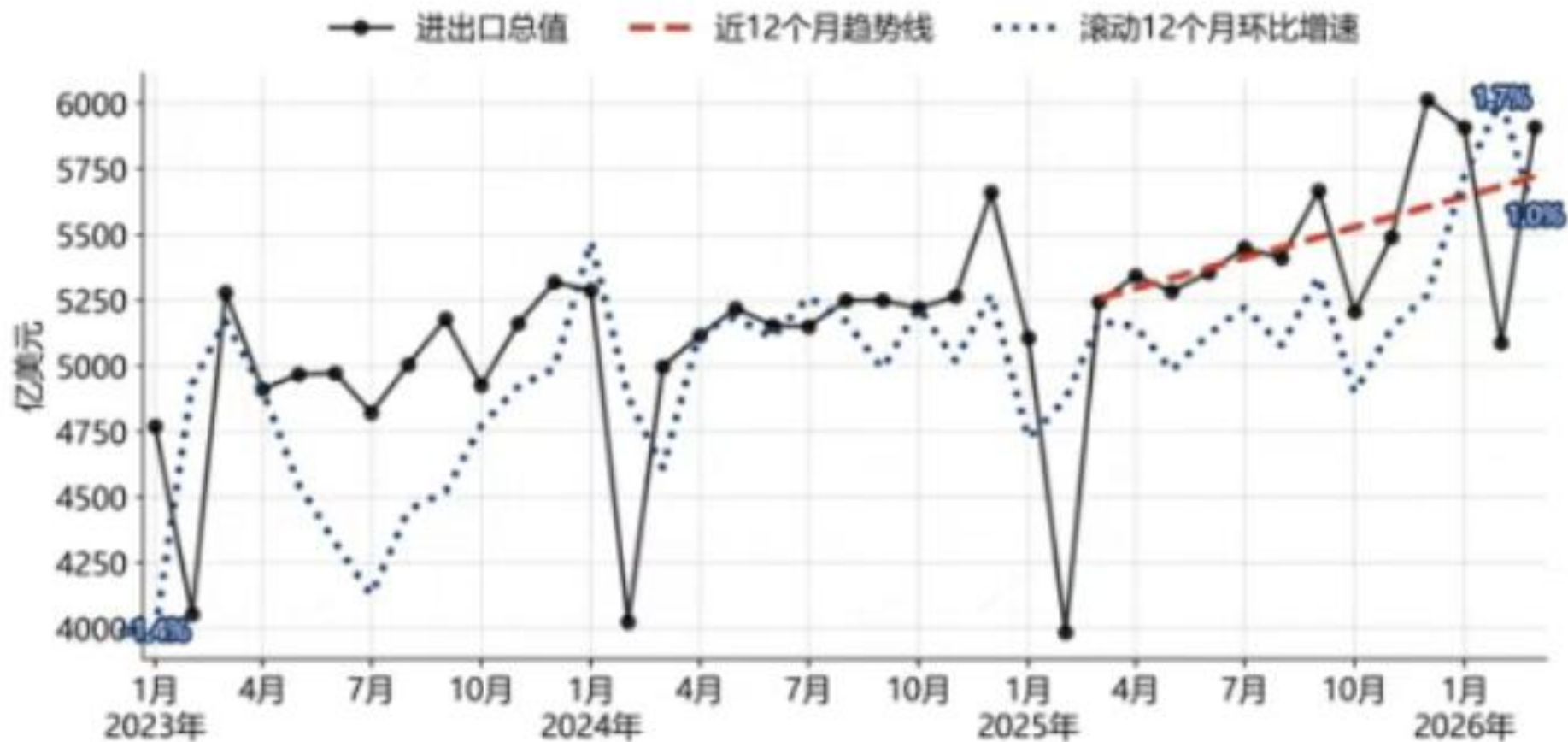
1-4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2.33万亿美元，同比上涨18.2%。

出口总值 1.34万亿美元，同比去年 ↑ 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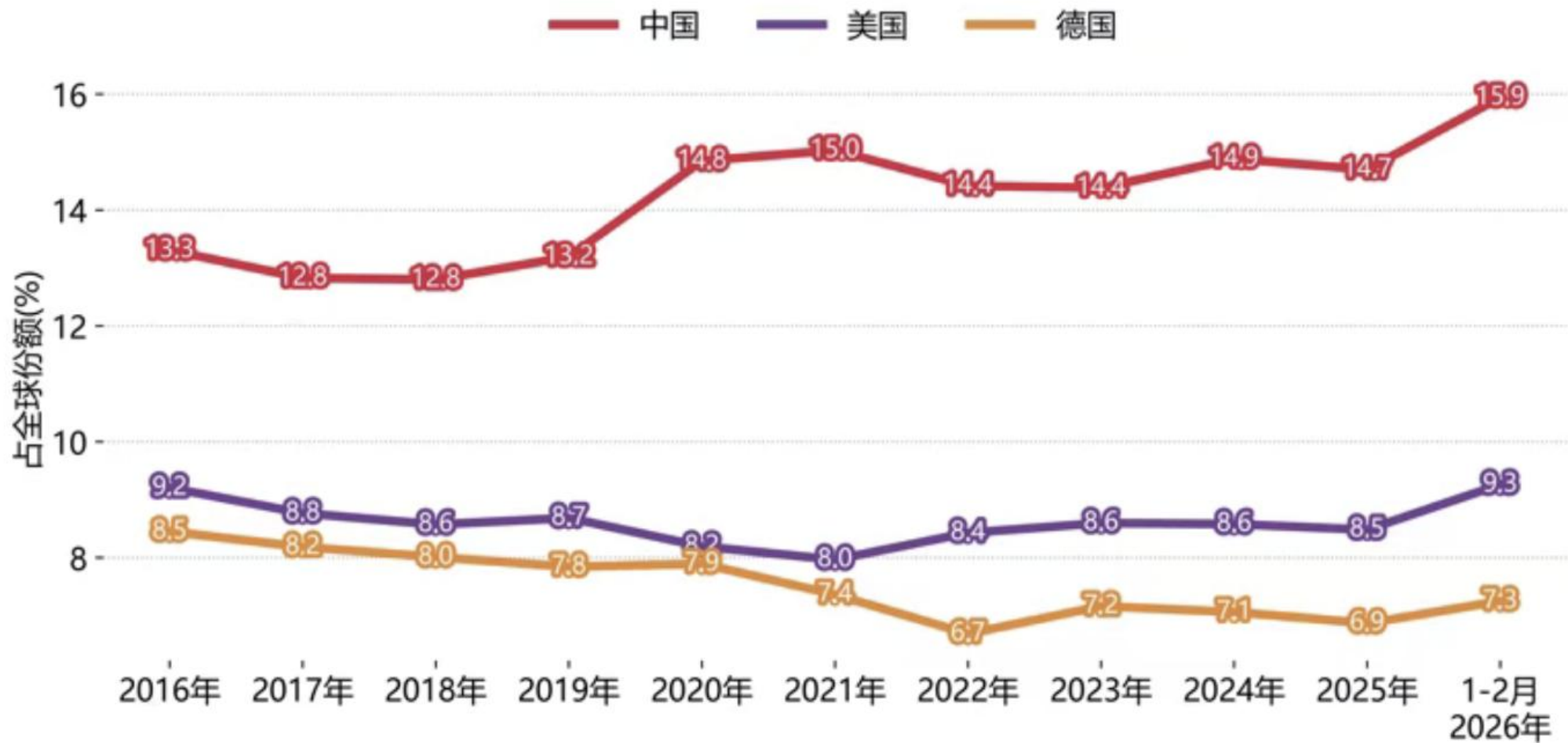
进口总值0.99万亿美元，同比去年 ↑ 23.6%

贸易顺差3477亿美元，同比去年 ↑ 20.0%

近期贸易发展势头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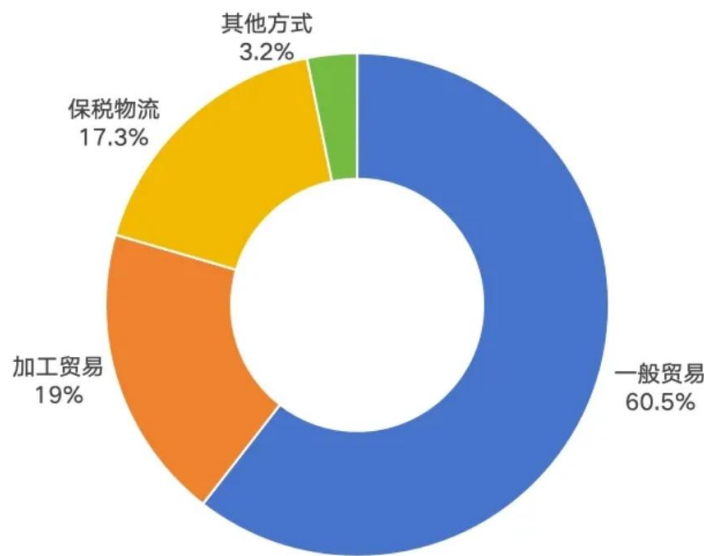


近期贸易发展势头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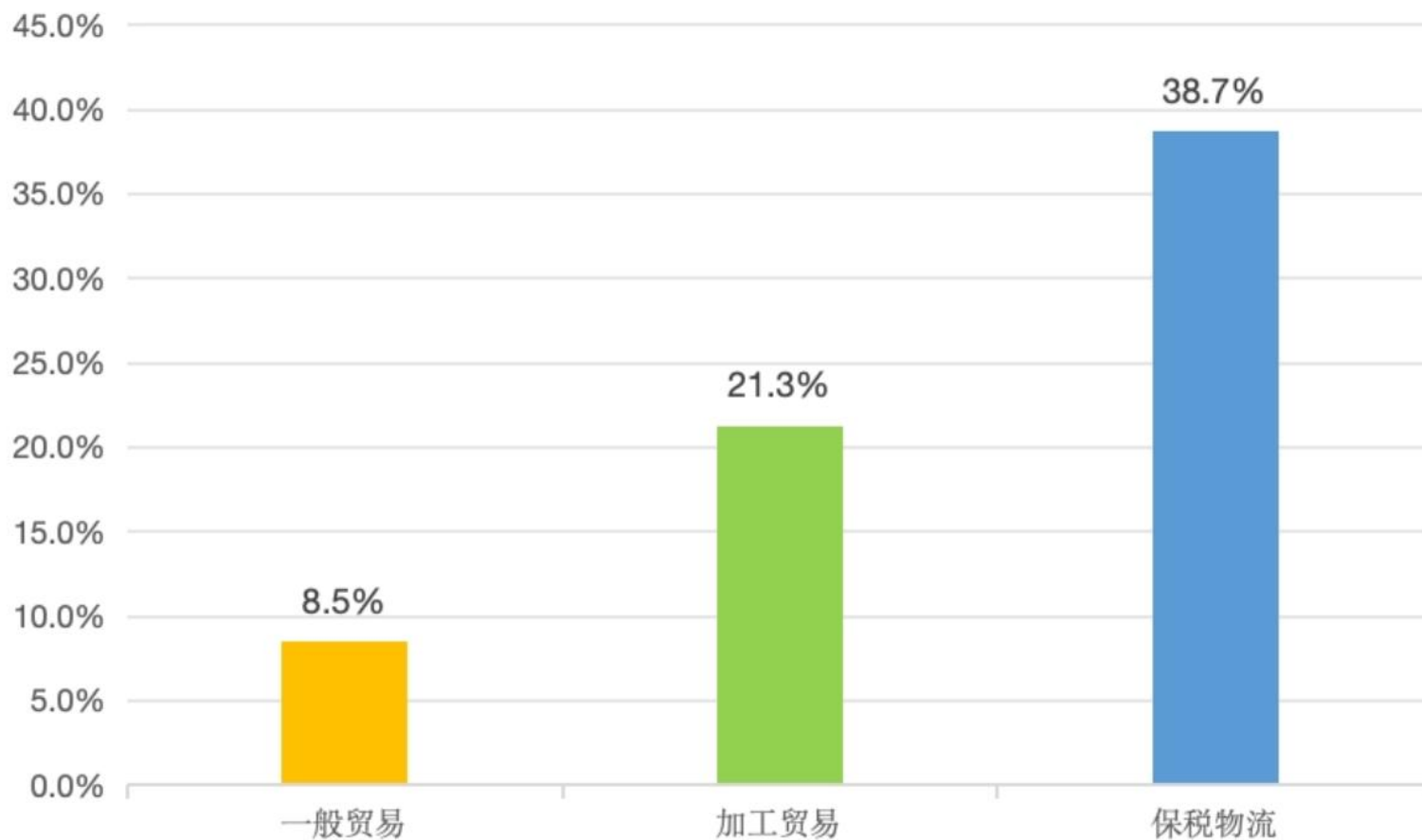


各种贸易方式均有增长

- 今年1-4月，一般贸易进出口9.82万亿元，增长8.5%，占外贸总值的60.5%。
- 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3.08万亿元，增长21.3%，占比19.0%。
- 同期，我国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2.81万亿元，增长38.7%，占比1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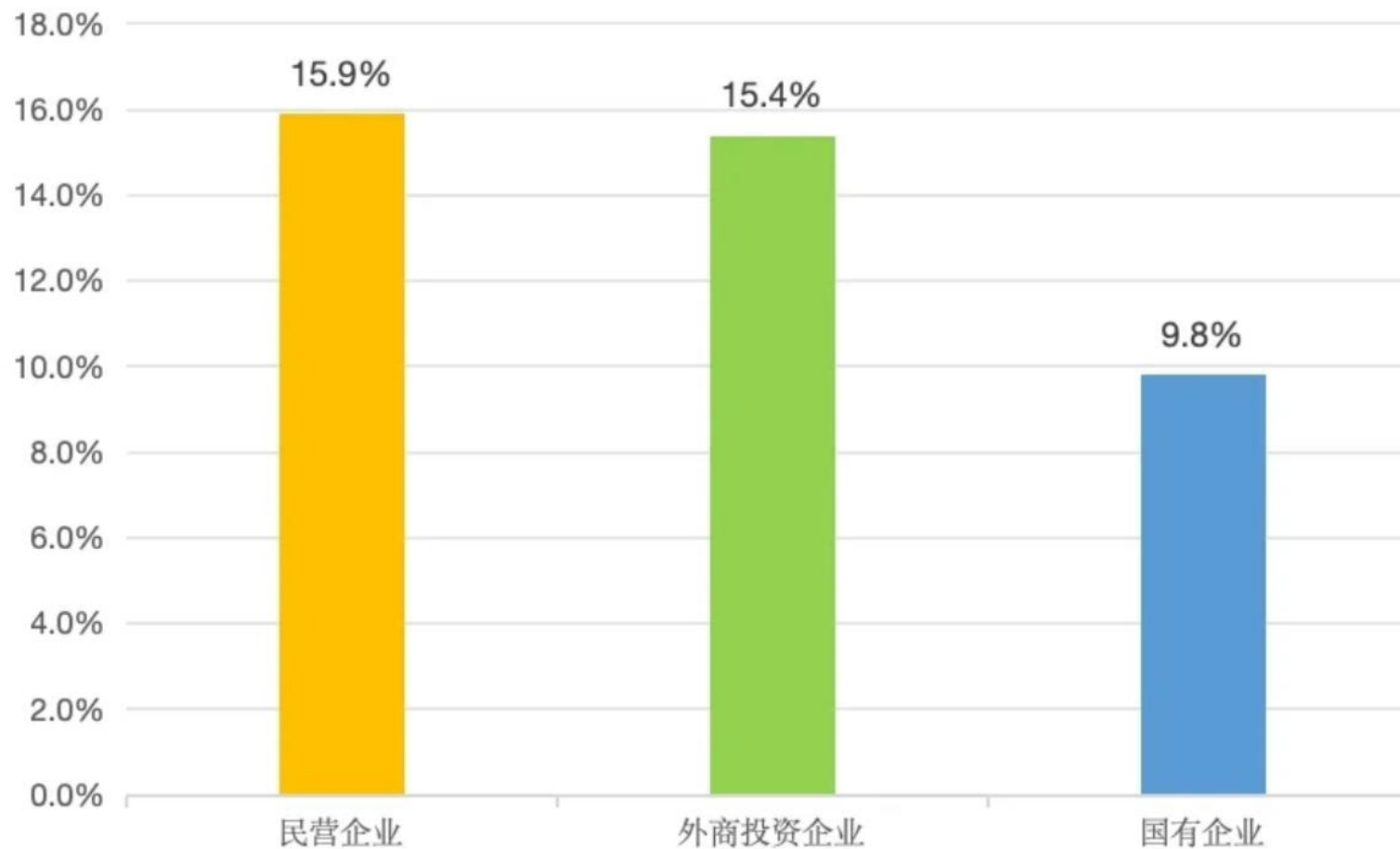
各种贸易方式均有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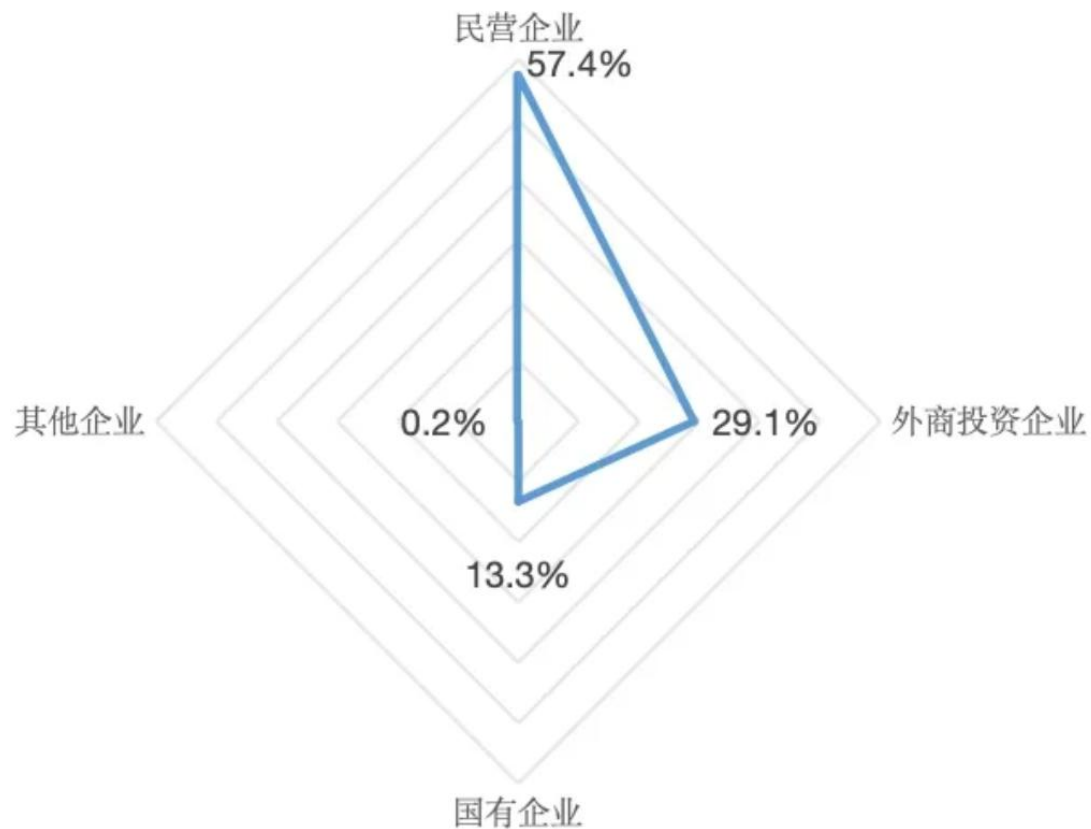
民营企业的贸易地位持续提高

- 2026年前4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9.31万亿元，增长15.9%；
-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4.72万亿元，增长15.4%；
- 国有企业进出口2.16万亿元，增长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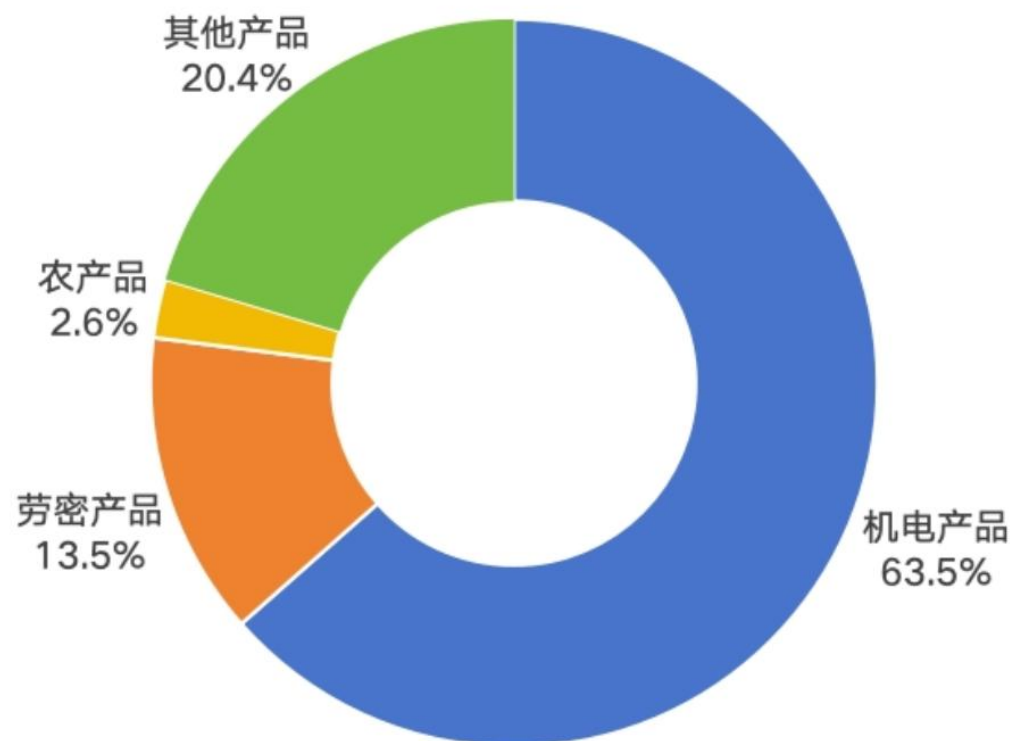
民营企业的贸易地位持续提高



民营企业的贸易地位持续提高



机电产品占出口比重超六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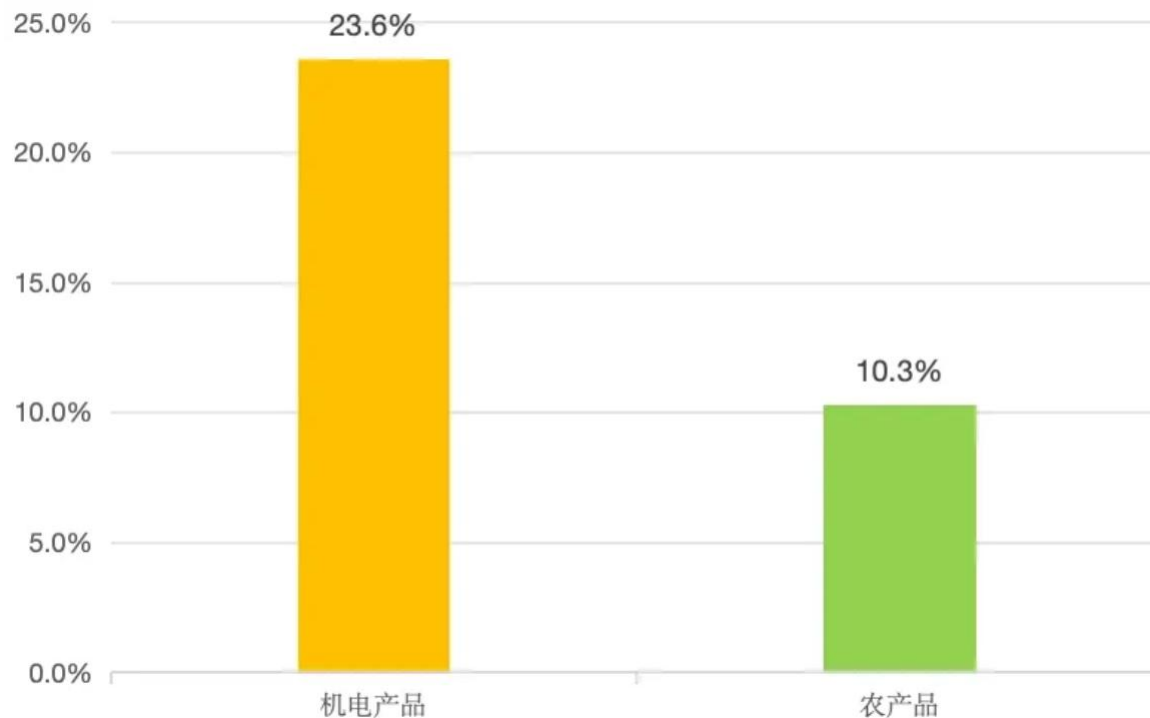


新质生产力推动贸易结构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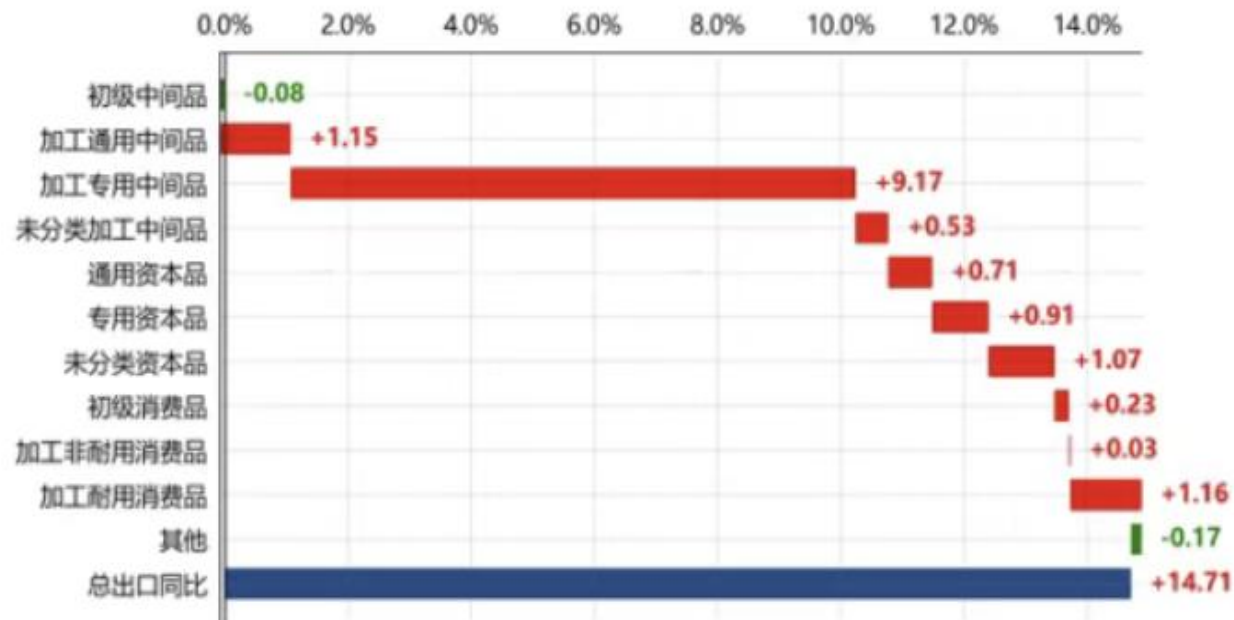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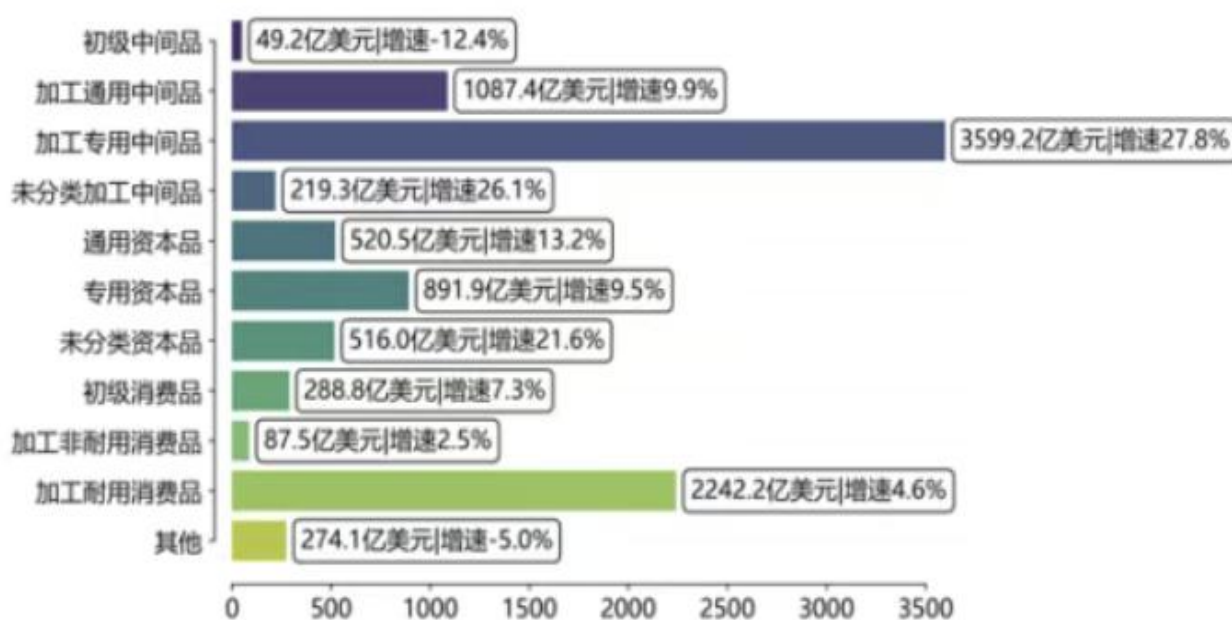
- 2026年1至4月，中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增长30%。
- 同期，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7.6%，其中电动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出口增长率分别为68.1%、43.2%、40.7%。

机电产品进口迅速增长

前4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2.76万亿元，增长23.6%；原油1.85亿吨，增加1.3%；农产品4757.3亿元，增长10.3%。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提升



贸易伙伴多元化布局持续推进

- 2026年1至4月，中国与东盟贸易额为2.75万亿元，同比增长15.7%。
- 同期，中国与欧盟贸易额为2.01万亿元，同比增长13.2%。
- 同期，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8.28万亿元，同比增长13.5%。

中国贸易发展的支撑力量

- AI赋能成为核心拉动力量
- 强大的制造业构筑了发展根基
- 经贸朋友圈扩容提质

2026年下半年中国贸易发展前瞻

- 宏观经济环境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国际经贸政策的逻辑发生根本变化
- 地缘政治环境不容乐观
- 产业链风险不断加剧

宏观经济环境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美伊冲突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关键能源与航运通道，迅速将冲击传导至全球，并通过“能源—农业—通胀”的传导链条，进一步推高总体通胀水平。
- 世界银行发布的成果显示，即便冲突立即结束，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仍将损失0.3 - 0.4个百分点，通胀将抬升2 - 3个百分点；若冲突长期持续，全球GDP可能下降约1个百分点，并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

宏观经济环境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在主要经济体内部，政策约束趋紧压缩宏观调控空间。
- **发达经济体**因高债务与政治分化，政策协调能力受到制约，而高利率与通胀粘性并存，使各国陷入“稳增长”与“控通胀”的两难。
- **发展中经济体**则面临资本外流与汇率贬值的双重压力，政策腾挪空间更为有限。

国际经贸政策的逻辑发生根本变化

- 传统的以效率至上和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多边体系加速退潮，各国政策制定者不再将经济收益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而是将供应链韧性、技术主权和地缘风险管控置于决策的核心考量。
- 特别是，美国正系统性地运用国内立法工具，将贸易政策武器化，以重塑有利于自身的全球产业链。

国际经贸政策的逻辑发生根本变化

- 4月，美国援引“232条款”对未签署贸易协议的国家进口药品加征100%关税，与此同时，美国国会推动的《MATCH法案》试图将对华半导体管制从尖端技术向成熟制程的DUV光刻机延伸，并施压盟友协同跟进。
- 此外，以日本和法国为代表的美国盟友体系内部，也在进行战略协调，4月，日法在东京举行峰会，推动稀土采购渠道多元化，构建“去中国化”的替代供应链。

地缘政治环境不容乐观

- 传统大国主导的安全秩序正在失去稳定锚点。美伊冲突的爆发及其后续僵局，使美国陷入战略困境，全球能源、金融与供应链体系被动承压。
- 地缘冲突的形态正发生深刻变化，呈现出“泛安全化”与“跨域化”趋势。冲突边界从传统军事目标扩展至经济、科技乃至民用体系，使冲突更具不确定性与外溢性。

地缘政治环境不容乐观

- 当今全球地缘政治已进入一个“高不确定性、多中心竞争、规则弱化”的新阶段。
- 未来，真正的风险不在于单一冲突的胜负，而在于各类安全机制与合作框架能否在失序过程中完成重构，否则局部危机极易演变为系统性震荡。

产业链风险不断加剧

- 以霍尔木兹海峡为代表的关键通道受阻，使能源、航运与保险体系同步失灵，冲击不仅体现在进口端，更通过价格、预期和金融渠道向制造业和出口部门传导。
- 科技产业链面临高端受限和内部竞争加剧的双重挤压。
- 产业内部“内卷化”正在侵蚀盈利能力并削弱产业韧性。
- 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合规与地缘政治风险正在快速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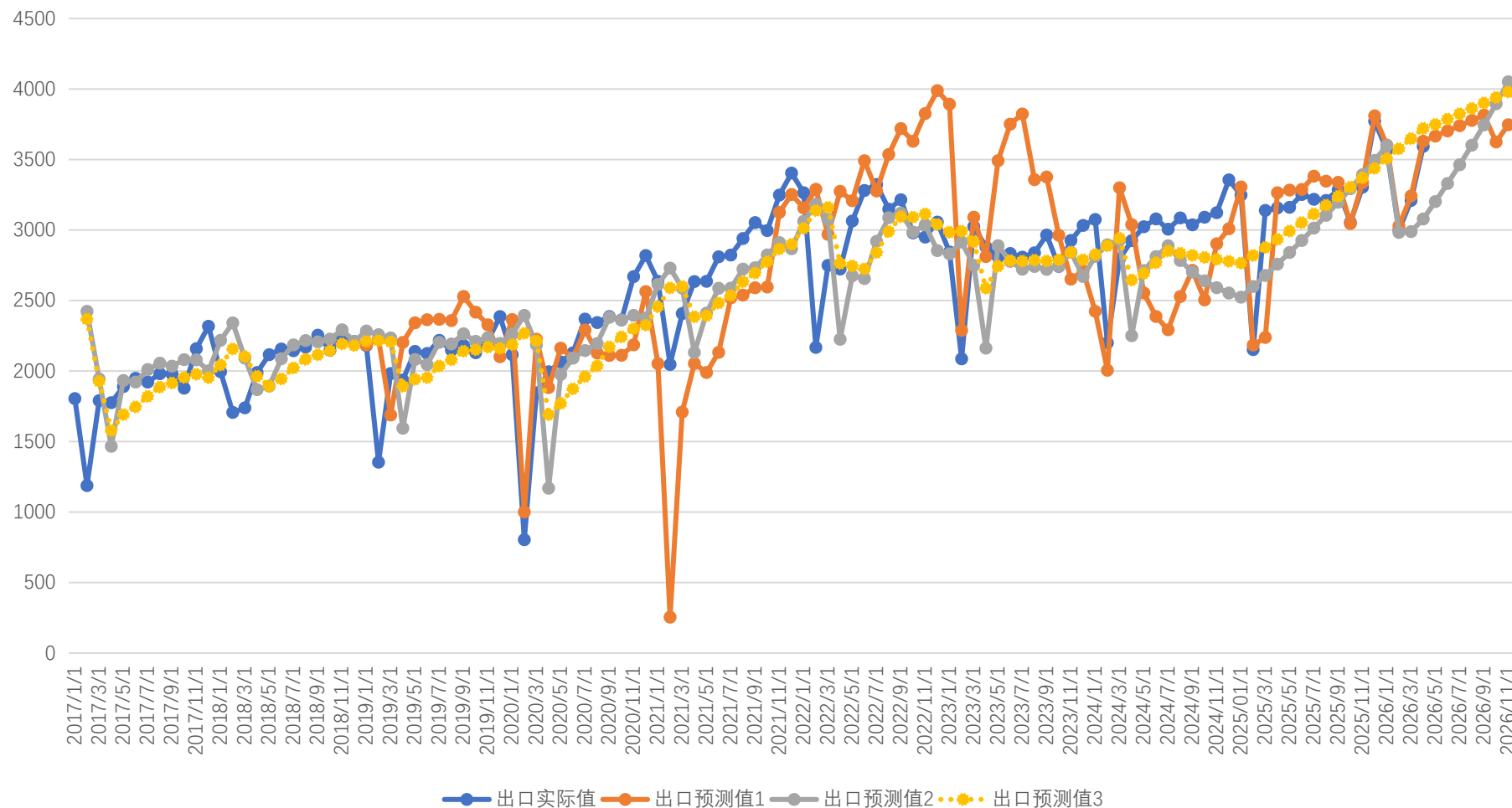
预测方法说明

- 使用时间序列分析中常用的ETS模型。
- ETS模型考虑了**误差、趋势和季节性**这三个因素对时间序列数据的影响，并根据它们的变化来预测未来值。
- Chronos-2模型基于大语言模型架构，拥有1.2 亿参数，其利用 Transformer 的注意力机制同步学习时间维度与变量间的关联关系，并以自回归方式生成未来序列，从而实现时间序列预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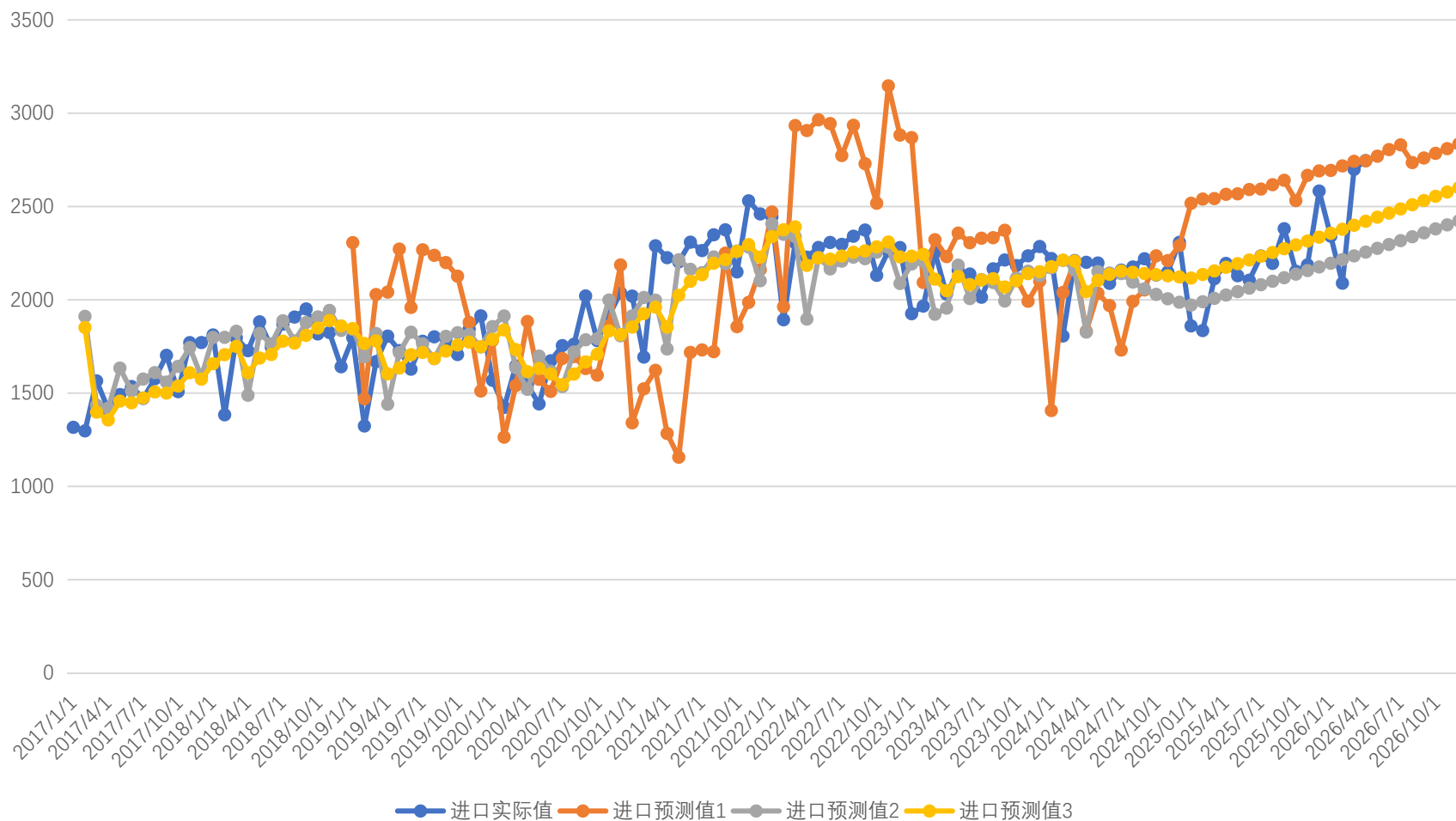
预测方法说明

- 我们基于自有数据对Chronos-2 模型进行了二次训练。
- 使用2017年1月至2026年4月的月度进出口数据，建立时间序列模型。
- 控制宏观经济环境、国际经贸政策、地缘政治环境和产业链风险等因素，设置三种场景进行预测，我们将展示三种场景预测的平均值。

出口预测值



进口预测值



预测结果小结

- 根据预测结果，2026年全年出口增长率为12.8%，出口规模约为3.77万亿美元；进口增长率为15.7%，进口规模约为2.99万亿美元。

以贸易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不确定性

- 以新质生产力培育对外贸易的核心竞争力
- 发展中间品贸易，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核心环节
- 重视新兴市场，打造贸易增长新蓝海
- 通过数实融合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

以新质生产力培育对外贸易的核心竞争力

- 新质生产力的崛起，是产业链升级、核心技术突破、国家政策赋能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
- 扩大产业链优势：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全链条协同，成本可控、交付高效，未来要进一步健全产业链，扩大这一核心优势。

以新质生产力培育对外贸易的核心竞争力

- 技术突破：未来要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率，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为高端产品出口奠定基础。
- 政策赋能：通过税收、研发补贴、跨境电商支持等政策，助力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加速新质生产力转化为外贸竞争力。

发展中间品贸易，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核心环节

- 发挥中间品贸易优势，主导部分产业链设计、核心零部件供应、高端制造环节，成为全球价值链的“引领者”。
- 以发展中间品贸易提升中国外贸的利润空间，增强中国外贸的韧性与话语权，有效对冲欧美市场需求疲软、贸易摩擦加剧的风险。

重视新兴市场，打造贸易增长新蓝海

- 进一步挖掘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补性需求。
- 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为企业开拓新兴市场提供有力支撑。
- 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

通过数实融合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

- 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 “按需生产、小单快返、快速交付”，降低库存积压风险，提升资金周转率。
- 海外建厂，规避关税壁垒，降低物流成本，贴近目标市场，快速响应客户需求
- 技术输出 + 配套服务，提升产品竞争力，增强客户忠诚度，实现从 “卖产品” 到 “卖方案、卖服务” 的升级，附加值大幅提升。

谢谢！

报告人：王孝松

wangxiaosong@ruc.edu.cn



CMF
China Macroeconomy Forum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聚焦“以贸易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CMF 专题报告发布

2026年5月3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 CMF 宏观经济热点研讨会（第120期）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以贸易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展开研讨。来自学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及行业专家毛振华、许斌、刘青、丁爽、程实、王孝松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孝松代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发布题为“以贸易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主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三个部分展开：

一、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

二、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成绩和风险

三、以贸易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不确定性

一、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

当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世界经济复苏动能不足、地缘政治冲突持续扰动全球贸易体系、大国竞争加剧经济与科技领域脱钩风险，共同构成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的外部压力。这些不确定性并非短期扰动，而是具有结构性、长期性和系统性特征，需要从全球经济、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三个层面加以把握。

（一）世界经济复苏乏力

世界经济整体仍处于缓慢复苏阶段，但恢复动能并不强劲。今年以来，多家权威机构已普遍下调对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反映出全球增长前景承压、风险因素增多的现实。

IMF 最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 GDP 增速为3.1%，且这一预测是在假设中东冲突影响有限的相对乐观情形下作出的判断。IMF 同时警告，如果冲突加剧或贸易脱钩进一步深化，全球经济增速可能显著低于当前预测水平。OECD 在3月份预测全球经济增长为2.9%，并指出结构性减速、生产率低迷、债务高企和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已达到数十年来高位。高盛此前预计全球经济增速为2.8%，认为美国减税和 AI 资本开支或可维持一定增长，但劳动力疲软和关税风险仍构成较大不确定性。

世界银行1月份报告则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仅为2.6%，并指出2020年至2030年或将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最疲弱的十年。联合国近期发布的报告也下调了全年增速预期，并提示能源供应中断、通胀回升和贸易萎缩可能进一步阻碍全球经济增长。

（二）地缘政治博弈冲击全球贸易体系

近年来全球资源紧张和区域冲突加剧，使地缘政治博弈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核心议题之一，并深刻影响世界经济运行。地缘政治冲突不仅导致能源价格波动和供应链中断，也改变了全球能源政策取向。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争使全球能源格局从“经济、低碳”优先逐步转向“安全、可靠”优先，各国开始调整能源政策以确保供应稳定。

地缘紧张局势还直接推高能源和运输成本，扰乱贸易航线，抑制企业和消费者信心，导致全球贸易增速明显放缓。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速将从2025年的4.7%大幅放缓至1.5%—2.5%，全球经济增速也将从2.9%回落至2.6%。报告认为，这一放缓的核心原因在于地缘政治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其中中东冲突可能引发粮食和能源价格再次大幅上涨，使高度依赖进口的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加严峻的粮食安全和财政压力。

同时，地缘博弈正在冲击多边贸易体系。全球贸易中按最惠国待遇开展的贸易比重，已从2025年初的约80%下降至2026年初的约72%。一方面，各国密集出台关税和贸易限制措施；另一方面，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快速增加，区域贸易协定逐渐取代多边机制，成为贸易规则的重要载体，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贸易规则碎片化。报告指出，区域贸易协定数量从2025年的

38项增至2026年预计的47项，显示阵营化规则构建和安全例外条款正推动世界贸易进入更加碎片化的阶段。

截至目前，美伊冲突仍悬而未决，中东战争延宕导致能源“结构性断供”，全球能源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东地区不仅是传统能源产地，也可能成为新能源矿产的潜在供应地，相关地缘博弈仍将进一步加剧。



地缘政治因素对贸易的影响

指标	2025年	2026年（预测）	变化趋势	主要驱动因素
全球商品贸易增速	4.7%	1.5%–2.5%	显著放缓	地缘冲突、供应链重组、政策不确定性
全球GDP增速	2.9%	2.6%	温和下行	投资延迟、消费疲软、能源成本高企
中美双边贸易增速	1.2%	0.5%–1.0%	持续低迷	出口管制、技术脱钩、市场替代
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年）	38	47	加速增长	阵营化规则构建、安全例外条款
最惠国待遇贸易占比	80%	72%	系统性下降	区域化规则替代多边框架

（三）大国竞争加剧全球不确定性

中美竞争加剧正在显著抬升全球不确定性。尽管目前中美关系尚未脱离“竞争中有管控、博弈中存交集”的基本框架，但经济和科技脱钩风险正在上升。美方持续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高端芯片、人工智能、量子等关键领域对华出口，并推动“友岸外包”；中方则强化产业链自主，并通过 RCEP、金砖等替代性机制拓展合作空间。这一过程导致全球供应链碎片化成本上升，也对创新协同造成阻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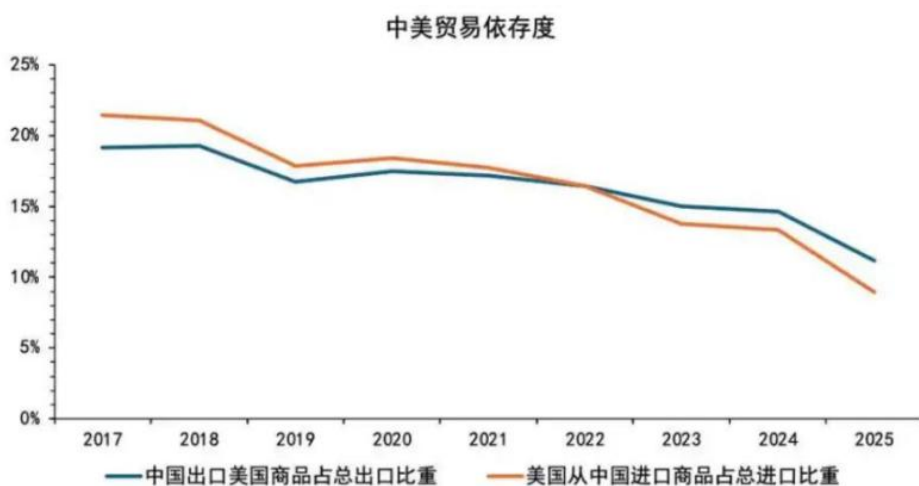
地缘和台海敏感点频发，也进一步加剧了不确定性。台湾、南海、科技标准主导权等议题容易被美国国内政治工具化，尤其在美国大选年更可能成为政策博弈焦点。近期元首级沟通暂时稳定了大局，但执行层面的“小动作”仍会削弱政策连续性。关税战、稀土管制、金融脱钩传闻等，也持续加剧企业投资观望情绪，使全球治理和市场信心承压。

这种不确定性并非临时性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美国将中国定调为“唯一既有意图又具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中国则坚持发展权与安全底线，双方存在制度和发展模式竞争。由于管控机制薄弱、信任赤字较高、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等因素叠加，中美关系中的误判风险有所上升。

从数据看，近年来中美贸易依存度持续下降。2017年至2025年，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占中国总出口比重由19.1%下降至11.2%；同期，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占美国总进口比重由21.4%下降至9%。这表明中美贸易依存度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中美贸易依存度不断下降



美国推动“友岸外包”和“制造业回流”，试图以政治意志重塑全球供应链，但这一战略并未充分尊重市场规律，也未正视资本回报率、劳动力成本和基础设施承载力的刚性约束。美国从中国进口比重明显下降的同时，从越南、墨西哥、中国台湾、印度、韩国等经济体进口比重均有不同程度上升，其中从越南和中国台湾进口比重上升均在4%左右。

以半导体和新能源等中美科技竞争重点行业为例，部分企业在美国政府压力下赴美投资设厂，但成本、效率和商业可持续性均面临较大挑战。台积电亚利桑那州项目投资规模达1650亿美元，但人力成本为台湾建厂的2至3倍，供应链仍严重依赖亚洲，项目毛利率明显低于台湾本土工厂；三星在得克萨斯州投资超过370亿美元，但面临建筑和劳动力成本上升、项目延期和成本超支等问题。

美国“友岸外包”和“制造业回流”并非基于市场效率的自然选择，而是由巨额公共补贴驱动、以政治目标为导向的资本注入。其将全球先进产能转移至美国本土，却未能解决成本结构、人才储备、供应链韧性和商业可持续性方面的根本缺陷。这不仅给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冲击，也使中国对外贸易和科技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

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反噬”本质

产业领域	企业	项目地点	投资规模 (亿美元)	成本超支/挑战	关键效率指标	项目状态
半导体	台积电	亚利桑那州	1650	人力成本为台湾2-3倍，供应链依赖亚洲	毛利率8% (vs. 台湾62%)	2025年量产4nm，实现盈利，但盈利依赖补贴
半导体	三星	得克萨斯州	370+	建筑与劳动力成本飙升，项目延期	量产时间推迟至2026年下半年	成本超支80亿美元，投产延迟
半导体	英特尔	俄亥俄州	1000	资金链紧张，战略方向摇摆	量产时间推迟至2030-2031年	变电站闲置，投资计划大幅放缓
新能源	LG新能源	密歇根州	>100	关键矿物依赖中国进口	电池组件本土化比例不足	为特斯拉供货，但上游供应链未脱钩
新能源	三星SDI	田纳西州	>100	劳动力短缺，技术转移困难	产能爬坡速度慢于预期	为特斯拉提供储能电池

二、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成绩和风险

在复杂外部环境下，中国对外贸易仍展现出较强韧性。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出口、进口和贸易顺差均保持较快增长，贸易方式、经营主体、产品结构和贸易伙伴布局持续优化，反映出中国完整产业体系、制造业能力和全球价值链枢纽地位对外贸发展的有力支撑。但与此同时，下半年外贸运行仍面临宏观环境、国际经贸政策、地缘政治和产业链风险等多重挑战，需要在总结成绩的基础上对风险保持清醒判断。

（一）今年前四个月对外贸易发展势头良好

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势头较好。以人民币计价，1—4月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超出市场预期；其中出口增长11.3%，进口增长20.0%，贸易顺差也实现两位数增

长。以美元计价，增长幅度更大，进口增速达到23.6%。从近一年趋势看，中国外贸增长较为稳健，增幅保持较高水平。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在主要经济体中外贸表现较为突出，占全球市场份额稳步上升。美国、德国等经济体外贸发展状况也较好，但并未呈现中国这样明显的发展态势。中国外贸的稳定增长，既得益于全球科技浪潮带来的新增需求，也得益于中国制造业体系完整、产业配套能力强和贸易伙伴多元化布局持续推进。



进出口显著增长

以人民币计

1-4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上涨14.9%。

出口总值 9.3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去年 ↑ 11.3%

进口总值 6.90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去年 ↑ 20%

贸易顺差2.4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去年 ↑ 11.3%

以美元计

1-4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2.33万亿美元，同比上涨18.2%。

出口总值 1.34万亿美元，同比去年 ↑ 14.5%

进口总值0.99万亿美元，同比去年 ↑ 23.6%

贸易顺差3477亿美元，同比去年 ↑ 20.0%

（二）贸易方式和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

从贸易方式看，各类贸易方式均实现增长。1—4月，一般贸易进出口达到9.82万亿元，增长8.5%，占外贸总值的60.5%。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3.08万亿元，增长21.3%，占比19.0%；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增长最高，呈现较快发展态势。在外贸总量明显增长的背景下，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保税物流均实现增长，说明中国外贸结构保持较强活力。

从经营主体看，民营企业贸易地位持续提高。2026年前四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5.9%，外资企业增长15.4%，国有企业增长9.8%，各类所有制企业外贸增速均较高。其中，民营企业在贸易中的占比已超过一半，达到57.4%；外资企业占比接近30%，国有企业占比为13.3%。这

表明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外贸发展的重要主体，也体现出中国外贸内生动力和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三）机电产品和中间品贸易表现突出，全球价值链枢纽地位进一步稳固

从产品结构看，机电产品占出口比重超过六成，达到63.5%，说明出口中的技术含量持续提高，新质生产力正在推动贸易结构优化。1—4月，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30.0%。同期，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7.6%，其中电动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出口增速分别达到68.1%、43.2%和40.7%，增长较快。进口方面，机电产品进口也迅速增长，增幅达到23.6%；消费领域进口同样有所增长，例如农产品进口增长10.3%。

从全球价值链地位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枢纽作用进一步稳固。报告依据 BEC 方法将产品按生产阶段划分后发现，加工专用中间品贸易增速最高，达到27.8%，对贸易增长贡献超过9个百分点。加工专用中间品贸易的快速增长，体现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从贸易伙伴看，中国贸易伙伴多元化布局持续推进。1—4月，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同比增长15.7%，与欧盟贸易额增长13.2%，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增长13.5%，经贸朋友圈持续扩大，多元化布局稳步推进。

中国外贸之所以取得较好发展成效，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人工智能成为核心拉动力量，AI 相关领域贸易额增长较快；第二，贸易背后是产业，强大的制造业构筑了外贸发展根基；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持续收缩，但中国经贸朋友圈不断扩大，贸易质量也在提升，除美国之外，中国与多数经济体的贸易保持持续增长。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提升



（四）下半年外贸发展仍面临多重风险挑战

展望2026年下半年中国贸易发展并做出预测，需先从四方面分析外贸面临的挑战。

第一，宏观经济环境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伊冲突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关键能源与航运通道，将冲击传导至全球，并通过“能源—农业—通胀”的链条进一步推高总体通胀水平。世界银行有关研究显示，即使冲突立即结束，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仍可能损失0.3至0.4个百分点，通胀抬升2至3个百分点；若冲突长期持续，全球GDP可能下降约1个百分点，并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从主要经济体内部看，发达经济体因高债务和政治分化受到政策协调能力约束，高利率与通胀黏性并存，使各国陷入“稳增长”和“控通胀”的两难境地；发展中经济体则面临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的双重压力，政策腾挪空间更加有限。

第二，国际经贸政策的制定逻辑发生根本变化。过去，各国政策制定通常以效率为先，崇尚自由贸易，由此形成长期维持的多边贸易体系。但当前多边体系加速退潮，各国政策制定者不再将经济收益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而是将供应链韧性、技术主权和地缘风险管控置于决策核心。美国正系统性运用国内立法工具将贸易政策武器化，以重塑有利于自身的全产业链。4月，美国援引“232条款”对未签署贸易协议国家的进口药品加征100%关税；同时，美国国会推动《MATCH法案》，试图将对华半导体管制从尖端技术延伸至成熟制程DUV光刻

机，并施压盟友协同跟进。此外，美国盟友体系内部也在进行战略协调，例如日本和法国在东京举行峰会，推动稀土采购渠道多元化，构建“去中国化”的替代供应链。

第三，地缘政治环境不容乐观。传统大国主导的安全秩序正在失去稳定锚点，美伊冲突爆发及其后续僵局可能使美国陷入战略困境，并使全球能源、金融和供应链体系被动承压。地缘冲突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呈现“泛安全化”和“跨域化”趋势，冲突边界从传统军事目标扩展至经济、科技乃至民用体系，使冲突更具不确定性和外溢性。**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已进入“高不确定性、多中心竞争、规则弱化”的新阶段**，未来真正的风险不在于单一冲突的胜负，而在于各类安全机制与合作框架能否在失序过程中完成重构，否则局部危机很容易演变为系统性震荡。

第四，产业链风险不断加剧。以霍尔木兹海峡为代表的关键通道若受阻，能源、航运与保险体系可能同步失灵，冲击不仅体现在进口端，还会通过价格预期和金融渠道向制造业及出口部门传导。同时，科技产业链面临高端受限和内部竞争加剧的双重挤压，产业内部“内卷化”也在侵蚀盈利能力并削弱产业韧性。随着越来越多企业谋求出海，合规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正在快速上升。

（五）模型预测显示全年外贸仍有望保持较快增长

在预测方法上，使用时间序列分析中常用的 ETS 模型，并结合 AI 模型对未来贸易走势进行预测。ETS 模型分别考虑误差、趋势和季节性因素；在此基础上，报告使用基于大语言模型架构、拥有1.2亿参数的 Chronos-2模型，利用 Transformer 注意力机制同步学习时间维度和变量间关联关系，从而生成未来时间序列预测。

报告基于2017年1月至2026年4月的月度进出口数据建立时间序列模型，并纳入宏观经济环境、国际经贸政策、地缘政治环境和产业链风险四类因素，设置乐观、折中、悲观三种场景，再取三种情形预测平均值。

预测结果显示，2026年全年出口增长率预计为12.8%，出口规模约为3.77万亿美元；进口增长率预计为15.7%，进口规模约为2.99万亿美元。重点产品方面，计算机零附件下半年增速可能有所放缓至98.6%，但全年增速仍有望达到125.6%；电动汽车等“新三样”仍将保持较高增速，下半年增速预计为67.2%，全年增速为73.9%；集成电路全年出口增速预计达到68.3%；

与新能源汽车相关的锂电池全年增速预计达到48.6%。这些领域将成为支撑出口较快增长的重要力量。

三、以贸易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不确定性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应坚持以贸易高质量发展增强外贸韧性和国际竞争力。关键在于把新质生产力培育、全球价值链嵌入、新兴市场拓展和数实融合发展结合起来，推动外贸从规模扩张进一步转向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和价值链地位提升。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只要坚持贸易高质量发展，就能够更好实现贸易利益，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增长。

（一）以新质生产力培育对外贸易核心竞争力

新质生产力对对外贸易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其崛起是产业链升级、核心技术突破和国家政策赋能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未来应进一步扩大产业链优势，依托中国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全链条协同能力，在成本可控、交付高效的基础上，继续健全产业链、扩大核心优势。

具体而言，应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率，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为高端产品出口奠定基础。政府也应通过税收、研发补贴、跨境电商支持等政策，助力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加速新质生产力转化为对外贸易竞争力。

（二）发挥中间品贸易优势，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核心环节

中间品贸易对于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应发挥中间品贸易优势，努力在部分产业链的设计、核心零部件供应和高端制造环节中发挥更强主导作用，争取成为全球价值链的引领者。

通过发展中间品贸易，可以提升中国外贸利润空间，增强中国外贸韧性和话语权，并有效对冲欧美市场需求疲软、贸易摩擦加剧等风险。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枢纽，但这一枢纽地位仍需进一步加强。

（三）重视新兴市场，打造贸易增长新蓝海

中美贸易不确定性仍将持续，尽管中美元首近期会晤有助于稳定大局，但未来仍将充满不确定性。因此，应进一步挖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互补性需求。前四个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增长14.8%，仍有较大潜力可挖。

未来可通过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运用 AI 赋能便利化流程，为企业开拓新兴市场提供支撑；同时，应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促进经贸合作进一步发展。通过更加多元化的贸易伙伴布局，中国外贸可以在全球市场波动中增强回旋空间和抗风险能力。

（四）通过数实融合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

运用新技术本身也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应特别重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企业可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按需生产、小单快返、快速交付”，降低库存积压风险，提升资金周转率。在企业“走出去”方面，应从法律、合规、物流和市场规则等维度加强研究，规避关税壁垒，降低物流成本，贴近目标市场，快速响应客户需求。

同时，应通过“技术输出+配套服务”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客户忠诚度，实现从“卖产品”向“卖方案、卖服务”升级，从而提高外贸附加值。只有综合理顺新质生产力培育和政策取向，才能实现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增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贸易力量。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 CMF 热点研讨会分析分析报告，与会专家围绕中国外贸走势、贸易高质量发展、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产业链重构、企业出海、全球价值链变化等问题发表观点。

渣打银行大中华区及北亚首席经济学家丁爽指出，近年来中国外贸表现总体好于预期。尽管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中国出口和进口仍保持较好增长，相比之下，提振内需面临的挑战更大。1—4月，以美元计，中国出口和进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贸易顺差仍处于较高水平。AI 超级周期是推动近期贸易增长的重要力量，计算机、集成电路等相关产品出口和进口均保持较快增长，显示出相关领域需求旺盛。同时，中国“新三样”出口继续保持强势，AI 相关产品、可再生能源和绿色发展相关产品成为出口的重要支撑。

当前中美贸易相对平稳，在中美元首会晤后，贸易休战状态可能延续，但中欧贸易摩擦正在上升。一方面，中欧贸易不平衡有所扩大；另一方面，中欧出口产品重叠度较高，新能

源汽车、钢铁等领域已出现加税、反倾销等措施，未来欧洲还可能继续使用本地含量规则、国际采购工具、外国补贴规则、网络安全法等政策工具，对中国形成新的贸易压力。

围绕应对措施，“十五五”规划中关于外贸的表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未来应加强贸易强国建设，推进进出口平衡发展，不能长期、持续依赖外需拉动增长，而应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推动外贸更加平衡。同时，应更加重视服务贸易发展，推动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并重。**从高质量发展角度看，中国外贸应逐步摆脱低价竞争和薄利多销模式，更加注重盈利能力，依靠技术和供应链优势提升国际市场黏性。**在政策层面，可适度优化财政补贴和出口退税安排，并在基本面支持下允许人民币温和升值，以促进贸易平衡、减少外部摩擦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表示，外贸在当前中国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十分突出。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外贸仍然保持较快增长，并在国内经济复苏反弹过程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中国外贸的良好表现，充分展示了我国制造业和全产业链优势，也体现出长期积累的外贸能力和韧性。

看待外贸要坚持“两分法”，既要看到优势，也要看到困难和问题。当前外贸面临的外部环境仍然复杂，地缘政治博弈依然严峻，美国政策调整持续对全球经济形成扰动，其重要目标之一仍然是中国。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缓和局势，但未来中美两个大国在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如何构建新的关系，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同时，全球产业链转移和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是中长期重要问题。中国既是上一轮全球产业链转移的承接者，也是新一轮产业链转移的输出者。未来部分过去由中国出口的产品，可能仍由中国企业生产，但生产地转移到其他国家，需要关注中国国内出口与中国企业全球布局之间的新关系。

外贸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有高质量产品出口。当前中国已不再是低质廉价商品供给者，而是高质量产品提供者。机电产品、电子工业、AI 赋能领域、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出口，体现了中国科研能力、制造能力和供应链优势。其次，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保障条件，尤其是良好的国际关系。应将外贸出口纳入整体国际关系考量，既要破解外部“脱钩”和所谓“民主供应链”等安排，也要构建中国自己的朋友圈。再次，高质量发展也包含高质量出海。中国企业出海已是大势所趋，应重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加强出海规划，明确哪些环节可以出去、哪些核心环节不能出去，防止产业链空心化和核心技术转移。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青**指出，本期论坛选题切中了两个重要现实要点：一是外部世界不确定性已经成为研判中国发展的重要变量；二是中国经济已高度融入全球化，理解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当前现状和未来趋势，都必须具备全球化视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与全球化进程高度相关，因此外部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具有重要影响。

刘青表示，**当前贸易高质量发展对中国经济具有重要贡献，而且这种贡献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未来两到三年，中国经济发展仍将与贸易发展密切相关。其背景在于，中国供给能力越来越强，但内需启动仍需要过程。供给端方面，中国制造业规模大、升级快，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均有较好发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能力和应用热情处于全球前列；需求端方面，消费和投资仍在恢复过程中，尚未完全启动。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出口高质量发展对中国经济依然十分重要。

刘青认为，**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根源在于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全球竞争力稳步提升**。中国产业发展的特点，一是持续升级、全球竞争力不断增强；二是国家系统工程和产业链配套能力较强。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既有“厚度”，也有“高度”。“厚度”体现在产业链完整性较强，许多产业从上游原材料、中间核心零部件到下游终端产品都有较强企业和竞争力；“高度”则体现在结构升级，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和“新三样”等领域成为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中的亮点。

对于外部不确定性，应辩证看待。一方面，贸易壁垒、供应链重组和技术封锁会损害贸易和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如果应对得当，外部压力也会倒逼产业和贸易升级，推动科技创新突破和产业链韧性增强。围绕政策应对，一要强化科技创新，突破“卡脖子”技术风险；二要在拓展多元化市场的同时高度重视亚洲贸易中心建设；三要推进制度型开放，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四要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和规则制定能力。面对外部变局，应以更强技术实力、更完整产业链和更开放的全球合作，在不确定性中增强发展主动权。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吴敬琏”经济学讲席教授**许斌**表示，**中国当前面临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本质变化**。经过四十多年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外部环境与十年前相比已有明显不同。全球化退潮、地缘政治重要性上升以及西方国家国内政治变化，使中国不能再以过去的方式处理与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中国当前面临的外部环境严峻且可能更加严峻，这是外部环境的底色，不会因美国总统人选变化而根本改变。

近期中国货物出口保持较高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实际汇率层面的竞争力变化。贸易竞争力取决于实际汇率，而非单一名义汇率。过去一段时间，虽然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相对稳定，但中国出口商品国内价格与其他国家竞争性商品价格之间的比率发生变化。中国价格低位运行，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处于通胀环境中，此消彼长，使中国商品在实际汇率意义上出现贬值，从而增强出口竞争力。但他也提醒，在当前地缘政治环境下，依靠价格竞争推动出口增长并非长久之计，未来价格继续下降的空间有限。

实现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过去中国经济增长在供给端依靠人口红利、资金红利和后发优势红利，但这些红利已难以延续，未来必须依靠真正实力，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率，也就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新质生产力。但经济不仅有供给侧，也有需求侧。当前中国要从依靠出口外需拉动的结构转向国内消费为主、内外需协同的结构，这一过程非常困难，也需要较长时间。

因此，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取决于能否完成“双转型”：一是在供给侧，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二是在需求侧，从外需为主转向内外需协同。他还提出“新质消费需求”概念，认为养老、保健、住房、AI时代的居住改造、个人理财、心理咨询、体验式消费等领域都蕴含大量新需求。未来应从“需求到供给”的思路出发，识别新质消费需求，再反向推动相应产业、产品和服务发展，从而为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内需基础。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指出，过去一年半以来，中国贸易持续表现出“超预期”特征。市场机构多次低估中国贸易能力，而新的事实又不断超出预期，这说明中国贸易不仅在量上发生变化，更可能正在发生质的转变。程实表示，应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和质量视角理解中国贸易的新变化，关注中国贸易在结构和能力层面发生了哪些转变，以及这些变化对未来政策选择意味着什么。

中国贸易韧性首先来自全球贸易路径越来越难以绕开中国。在变乱交织的全球环境中，其他国家开展贸易时，其最优贸易路径往往仍绕不开中国，这是中国贸易在动荡环境中保持韧性的关键原因。其团队基于全球价值链变化的测算显示，中国作为全球供给中心的结构性角色持续增强，已经成为连接最为密集的出口节点，中国出口创造的增加值通过高密度网络路径广泛嵌入全球各地生产函数。这表明，中国当前贸易表现并非短期偶然，而是过去十多年持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参与全球化和强化产业能力建设的结果。

进一步来说，中国贸易实力正在从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转移。中国贸易能力强，并非仅源自宏观变量变化，更深层次地来自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能力提升和地位上升。中国正在成为难以替代的超级“路由器”，产业全谱系优势以及重点产业全球增加值份额在过去十年中系统性上升。与此同时，中国出海也在从“产品出海”走向“跨国建链”，经历从产品出海、产能出海到生态出海的升级，把中国供应链能力向外延伸，并与贸易伙伴共同分享扩链利益。

同时，中国贸易韧性还来自“向上突围”，即制造业持续升链、价值空间不断打开。贸易不应只追求规模和体量，更要形成影响力、盈利能力和持续竞争力。当前，中国制造正沿着价值链持续上移，从加工装配端向中间核心产品供给端转型，规模创造正在转向价值获取。中国贸易韧性更多源自过去数十年久久为功的能力建设，源自微观能力而非单纯宏观环境；未来政策重点应放在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话语权和影响力。

多维发力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

毛振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毛振华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20期）上的发言

外贸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在国民经济稳健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精准研判外贸发展现状，破解发展难题，夯实发展动能，是推动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一、坚持两分法看外贸，韧性与挑战并存

中国外贸增长轨迹与国内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展现出极强的韧性，这既得益于我国完备的工业体系，同时也是我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对外开放的成果积累。外贸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作为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的重要板块之一，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 GDP 增长贡献率连续两年超过30%，显著高于资本形成总额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2024年及2025年分别为22.9%和15.3%），同时出口同比增速连续两年高于 GDP 同比增速。2026年一季度，出口延续向好态势，同比实现14.7%的较高增速水平，显著高于一季度 GDP 同比增速，虽然受地缘冲突影响后续面临一定压力，但全年来看仍有望保持韧性。近年来，外贸的稳健增长，充分印证了我国完备制造业体系、全产业链布局的核心优势，这是我国长期深耕外贸领域、持续夯实出口能力建设的成果积累，更是我国外贸发展必须长期坚守的核心优势与发展底气。

看待我国外贸发展需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面临的多重挑战。中国外贸的成长始终伴随着外部压力与挑战，且呈现出“压力越大、韧性越强”的发展特征。过往外贸增长的亮眼数据常被归因为“抢出口”，而如今阶段性超额增长已成为常态化发展态势，充分彰显了外贸内生动力的持续增强。但与此同时，当前外贸发展仍面临多重深层次、中长期挑战，制约着高质量发展进程。

一方面，地缘政治博弈持续加剧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中美关系短期出现边际缓和迹象但能否延续有待进一步观察、长期看大国博弈基调未变，此外我国周边区域的不稳定因素仍存。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持续动荡，大国博弈仍是扰动全球经济的核心变量，美国的政策调整虽阶段性聚焦伊朗、俄罗斯及拉美地区事务，但其核心靶向始终是中国，一系列外围布局或均为后续中美更深层次的战略对峙铺垫。尽管近期中美元首会晤有效缓和了短期局势，但中美两国新型政经关系尚未定型，未来中美两个大国在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的领域中构成何种新的关系还有待观察，但中美长期博弈的核心格局并未改变。此外，从周边环境来看，日本、菲律宾等周边国家带来潜在竞争压力与突发风险，我国面临的区域不稳定因素持续存在。诚然，今年以来我国对外交往持续升温，多国元首携经贸代表团访华，我国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外部发展环境稳步优化，但长远来看，地缘政治风险仍需警钟长鸣，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冷静。

另一方面，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转移与重构趋势难以逆转，是影响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变量。在全球产业转移浪潮中，中国既是上一轮全球产业链转移的核心承接国，成功依托产业转移建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本轮产能输出、产业转移的核心参与国，正深度参与重塑全球产业格局。我国现代产业链的发展，依托于计划经济时代奠定的全门类产业基础。该体系虽起步阶段技术相对落后，但覆盖范围完整，为我国构建起完备且具备较强实力的产业链提供了有力支撑。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与转移已是客观现实，且这一轮产业转移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明确我国在未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中的定位，是当下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其一，纵观本轮产业转移，全球生产环节依旧离不开中国力量，但我们需要厘清国内出口与我国企业海外布局所形成的新型产业链、供应链格局之间的关系。产业转移会对我国国内出口形成明显压力，以往大量商品由国内生产并直接出口，未来部分产能会由中资企业设在海外的基地完成生产及出口。从统计口径来看，这部分产值计入东道国 GDP，不过同时也归属于我国国民总收入（GNI），逐步形成“中国人经济”。**其二**，本轮产业链供应链转移，深受地缘政治与外部发展环境的影响，外部因素的影响作用凸显。产业重构与地缘政治风险叠加，外部遏制、供应链脱钩风险持续存在。**其三**，国内市场的过度竞争，对我国外贸发展、产业链进阶及产品升级带来负面影响。经营困境之下，企业利润不断收窄，制约产品质量升级与技术迭代。当前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已从以往主打物美价廉的消费品逐步转向产业链中高端的高技术产品，而出口结构升级与本土制造业发展水平高度绑定。近年来国内市场主体经营承压明显，产业升级动力不足，已成为制约外贸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

二、多维协同发力，构建外贸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需跳出单一产品出口思维，从提高产品竞争力、加强外部保障体系等维度发力，推进外贸高质量发展。

（一）继续深耕高端产品出口，筑牢外贸核心竞争力

坚守高质量产品的出口导向，出口高质量产品是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与根基。2025年，中国以占全球约30%的制造业增加值和超过14%的出口市场份额，继续在全球制造业和贸易中占据领先地位。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仅日不落帝国时期的英国、二战后的美国曾达到相近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彼时英国、美国在对应时期均为全球综合实力第一的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均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我国目前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出口却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正是得益于我国自身产品的竞争力与供应链优势。

持续深化国内产业升级与出口贸易的双向联动，有效破解国内产业内卷困境。现阶段，我国出口产品结构正在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加速优化升级，尤其是与 AI 相关的机电产品、新能源汽车、高端消费品、生物医药等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产品，正逐步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这类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优势，是我国科研创新能力、先进制造水平与完整供应链体系优势的集中体现，标志着我国已逐步摆脱以往廉价的商品供给定位，转型为全球高质量产品的供给方，这一良好发展态势必须持续巩固。未来我们需持续强化国内产业升级与外贸出口的双向联动、良性互动，依托国际市场的竞争检验、需求拉动，反向赋能国内产业迭代升级。以往国内企业多依靠国内市场利润支撑出口业务发展，而当前发展格局已发生反转，众多企业依托外贸出口的利润优势，反哺国内市场经营与产品迭代。这一产业内外循环的新模式，成为破解当前国内市场竞争内卷、激活产业发展活力的重要突破口。

（二）构建高质量外贸发展保障体系，优化外贸发展环境

实现外贸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完善的外部保障体系，其中维护良好的国际关系是核心关键。国际环境的复杂性深刻影响我国外贸走向，当前复杂的国际博弈要求我们必须将外贸布局深度融入整体国际关系战略之中。一方面，要主动破解外部遏制壁垒，打破美国主导推动

的“脱钩断链”、构建排他性“民主供应链”等企图；另一方面，积极拓展国际“朋友圈”，依托各方阵营存在的分歧与利益差异，构建长期稳定的多边经贸关系。

过往一段时期，受外部局势变动影响，我国迎来一定的外交缓冲空间，但长远来看，国际关系的博弈与挑战依旧严峻。对此，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与发展自信，不受短期局势扰动影响，持续打造支撑外贸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坚定维护国家对外经济利益，在国际博弈与竞争中构建化解分歧、抵御风险的长效机制。以中美关税博弈为例，自去年4月关税争端升级以来，我国在被动局面下果断应对、精准反制，取得了良好成效，也是全球对美关税博弈中唯一实现有效制衡、赢得主动的国家。这也启示我们，对外经贸博弈需把握平衡尺度，既不能一味退让、奉行绥靖主义，也不宜采取硬碰硬的对抗模式，需秉持灵活审慎的战略思维精准施策。

从商业层面来看，要坚持差异化应对原则。中国商界素有“顾客就是上帝”的经营理念。海外市场与合作对象是我们外贸发展的依托，要用心维护好的关系。但面对反华政客和敌对势力，必须坚决予以回击，全力保障中国企业、中国产品在公平的国际环境中开展贸易。这项工作落地难度不小，需各部门强化协同配合。各领域行事要立足全局，避免因局部言行引发不必要的纷争，给整体外贸与对外关系增添压力。在该坚守的立场、该维护的权益面前，我们要果断出手、主动作为。过往部分强国在进行商品、资本对外输出时，往往依托国家综合实力保驾护航。如今，我国依托国家综合实力，为本土产品出海、中国企业深耕全球市场保驾护航，同样是至关重要的任务。

三、企业出海是大势所趋，与高质量外贸相辅相成

外贸的本质是产品的跨国流通，伴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重构，中国企业出海已然是顺应时代的大势所趋。如前所述，国内产业外迁、海外本土化生产，客观上会对我国本土出口带来一定负面影响，但我国供应链体系根基稳固、配套完善，尤其是高技术产业的核心技术、核心产能、核心专利均牢牢掌握在本土手中，能够有效对冲产业外迁带来的出口风险。

我国产业发展与外资引入的历史经验，充分印证了产业链布局的阶段性规律，我们要把握当前的历史机遇。以汽车产业为例，我国汽车工业的崛起，核心得益于早期引入外资、搭建合资企业的发展模式。过去我国汽车产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通过吸引外资企业来华建

厂，快速补齐了产业短板，大幅提升了本土汽车产业的生产能力与市场竞争力。而外资企业也曾凭借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供应链掌控权及专利壁垒，在华获取了高额利润。早年日系车企的部分同款车型在中国的售价往往显著高于美国。这种利润差距，正是特定发展阶段下，核心技术、供应链体系、专利壁垒及利润转移规则等带来的必然结果。在相当长时间内，我们确实让渡了巨额利润，并在部分核心技术领域受制于人，但也为我国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以史为鉴，可见企业全球化布局是获取产业转移红利、稳固全球分工地位的关键。因此，我们必须正视产业转移的历史规律，把握发展机遇，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最大化争取国家产业利益。

推进企业高质量出海，妥善进行企业国际化布局，我认为有几个方面需重点把握与思考。

一是深刻认识到产业出海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将深度参与并主导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当前这场产业链重构是世界级的，是一个不可逆的长期过程，而中国正身处这一浪潮的核心。中国企业在未来形成的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新格局中将扮演重要角色，其结果很可能优于前几轮产业转移中的传统转出国，因为他们当年并未像今天中国这样，推动如此大规模的企业赴海外投资设厂。若能把握住这一机遇，中国将在全新的全球产业布局中占据比以往任何转出国都更为有利的地位，绝不能只停留在被动观望，待到转移完成、他国产业链崛起之后空余慨叹。如英国在产业外迁过程中，鲜有本国企业在全球广泛布局生产，而日本与德国则在全球产业链转移中，通过积极的海外扩张，保住了相当程度的产业影响力和长期收益。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将当前的出海行动，与全球布局重构紧密联系起来。这并非简单的产能外迁，而是通过主动布局，重新嵌入并主导新一轮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关键一跃。

二是海外绿地投资迎来重大机遇，但需兼顾机遇与风险。当前部分产业转入国亟需外部资本、技术与成熟产能支撑本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持高度欢迎态度。但同时中资企业必须清醒研判外部环境风险，警惕部分国家存在地缘政治干预、政策波动、法律壁垒等潜在风险，企业出海布局需稳中求进、审慎合规。

三是着力培育世界级中资跨国公司，这是构建中国强大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传统发展模式依托进口原材料、能源矿产，在国内加工组装后外销全球，资源配置模式单一、附加值有限。相较之下，搭建跨国公司体系、实现全球资源优化配置，是更高效的发展路径。苹果公司作为一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美国企业，尽管它总部位于美国，但其研发网络遍布全球，产业链更是深度整合了世界范围内的优质资源。对此，需更新对跨国公司发展的认知，

唯有培育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才能夯实我国经济实力，提升复杂国际局势下的风险抵御能力与话语权。

四是坚持产业链内外协同联动，防范产业空心化与技术外流风险。企业高质量出海绝非无序外迁，必须强化顶层规划与精准管控，严格区分可外迁产能与不可外流的核心技术、核心产能，防止产业空心化、核心技术外流。当前国家层面已高度重视产业出海规范发展，后续需搭建系统化、全方位的配套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全球产业链重组、海外产业投资、国内内需扩容、本土产品竞争力提升等重点工作，实现产品、技术、商业模式协同出海，推动海外产业布局与国内产业升级双向赋能。

以新质消费需求牵引外贸高质量发展

许斌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吴敬琏经济学讲习教授

以下观点整理自许斌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20期）上的发言

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如何以贸易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首先，中国当前面临的是怎样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其次，如何评估近期货物出口的高增长势头以及其可持续性；最后，如何真正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一、全球化退潮和地缘政治上升，是中国外部环境的基本底色

中国经济经过四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当前面临的外部环境已经与十年前发生本质变化。主要原因在于全球化退潮以及地缘政治重要性的上升。中国经济在21世纪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并实现快速崛起，使中国已经不能再用过去“韬光养晦”的方式与世界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处理贸易和投资关系。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国内政治环境变化，也促成了对中国整体不友好程度的上升。中国目前面临的外部环境比较严峻，而且这种严峻性还可能持续上升。这是中国外部环境的底色，无论谁担任美国总统，美国遏制中国进一步发展都会是其必然战略选择。

不同美国总统的区别，更多体现在政策方式和不确定性上。奥巴马、拜登时期的对华战略更加传统，通常会联合西方盟友对中国进行系统性遏制，政策路径相对更有确定性。特朗普的风格则更倾向于“单打独斗”，从中长期看，这一风格可能给中国带来一定空间；但从中短期看，高不确定性会给中国经济造成较大压力，因为很难判断其何时推出新的政策冲击。

5月份中美元首会晤后，中方提出“构建建设性中美战略稳定关系”，这是一个高屋建瓴的定位。面对一个总体上对中国并不友好的外部环境，尤其是面对特朗普式高不确定性的美国总统，中国首先追求的是稳定，即降低不确定性；但“建设性”同样重要。稳定本身可以有不同状态，既可以是比较建设性的稳定，也可以是具有破坏性的稳定。中国希望建立的是稳定且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当前特朗普面临多重内外困局，默认接受中方这一定位可能是其较优选择；但一旦其他困局缓解，其对华政策不确定性仍可能回归，对此需要保持清醒认识。

二、近期出口高增长与实际汇率变化有关，但低价竞争空间有限

评估中国近期货物出口高增长，不能只看名义汇率，更要看实际汇率。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过去三年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约16%；OECD数据也显示贬值约12%。贸易竞争力取决于实际汇率，而不是人民币兑美元等单一名义汇率。所谓实际汇率，关键在于中国出口商品国内价格与其他国家同类竞争商品价格之间的相对变化。过去几年，中国面临价格低位运行状态，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经历较高通胀。此消彼长之下，即便人民币名义汇率相对稳定甚至有所升值，中国商品在实际价格上仍然表现为更具竞争力。

因此，近期出口数据亮眼，一个重要驱动力是企业通过价格竞争进一步增强出口竞争力。换言之，中国出口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把价格又“卷”低了，这也是为什么在地缘政治时代、全球贸易环境并不友好的情况下，中国出口仍然能够保持较强表现。

但这也带来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价格下降还有多少空间？低价竞争可以在短期内形成出口支撑，但如果长期依赖“卷”来维持外贸增长，就会压缩企业利润，削弱创新能力，并影响外贸高质量发展。因此，出口高增长虽然值得肯定，但必须看到其背后的结构性约束。

三、中国经济需要完成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双转型

从中长期看，真正重要的不是某些短期因素，而是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过去中国经济增长在供给端依靠一些“青春期红利”，包括人口红利、较高储蓄率形成的资金红利，以及相对落后阶段带来的后发优势红利。正是这些红利支持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今天，这些红利已经难以继续维持。一个人青春期过后，如果还想继续成长，就不能再依赖自然长高，而要依靠学识、职业素养、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等综合实力。对应到中国经济，就是要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率，用经济学术语说，就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用当前更贴切的表述，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

供给侧转型需要新质生产力引领，也需要现代国家制度和企业制度建设共同支撑。但经济学不能只有供给侧，还必须看到需求侧。过去全球化时代，中国生产的价廉物美商品可以销往世界很多地方，这是一种双赢格局。但国际贸易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提高效率，另一方面也会加剧不平等。

全球化使“大饼”变大，但并非所有国家、企业和个人都从中受益。一部分群体不仅没有多分到一块，甚至相对境况更差，这引发了政治矛盾，也成为特朗普以及全球极端政治力量进入主流政治的重要原因。正因如此，外部需求对中国的约束比过去明显增强。

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取决于能否成功实现双转型：在供给侧，从“量”转向“质”；在需求侧，从外需为主转向内外需协同。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国际贸易不再重要。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仍然需要外需，内需培育既困难也需要时间。关键在于，外贸高质量发展必须与内需升级形成新的协同关系。

四、以新质消费需求牵引新质生产力，形成从需求到供给的新逻辑

在需求侧，需要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新质消费需求。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引领中国供给侧转型的重要概念，但在需求侧，也需要识别和培育新的消费需求。

所谓“新”，是指一些需求在人生周期或社会发展中真实存在，但成熟产品和服务尚未充分供给。例如老龄化背景下，很多家庭需要能够替代人工、夜间照护老人的产品或服务，但目前市场上成熟供给仍然不足。这类尚未被充分满足的需求，就是需要被识别和创造的新需求。

所谓“质”，并不必然意味着高价或高端，而是适用品质。技术经济学中有“适用技术”的概念，类似地，消费领域也需要“适用品质”。中端人群有中端适用品质，高端人群有高端适用品质，低收入人群也有适合其支付能力和生活需要的品质供给。不同平台、不同消费层级的存在，正说明需求是分层的。

新质消费需求的空間非常广阔。养老、保健、住房、个人理财、心理咨询、焦虑和抑郁等精神健康服务，以及体验式、沉浸式消费，都可能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可以提升供给效率，也可以帮助发现消费者痛点，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形态。

因此，不能只沿着传统“供给到需求”的思路来理解经济转型，好像只要掌握了技术、发展了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就会自然腾飞。过去东亚模式能够行得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庞大的发达经济体吸收需求。今天，全球地缘政治和外部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中国更需要把逻辑倒过来，从“需求到供给”进行思考。

这意味着，政策和企业都要先识别新质消费需求，再反推需要什么样的产业、产品和服务。传统投入产出表强调从产出倒算投入，未来在重点领域可以探索“消费需求—生产投入—产品服务产出”的新逻辑。计划和市场并不矛盾，战略性行业需要政策识别和引导，大多数领域仍要依靠市场机制发现需求、配置资源。

外贸高质量发展最终也离不开这一逻辑。只有发展适合新质消费需求的新质生产力，才能真正带来中国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因为新的国内需求会倒逼供给升级，而供给升级又会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推动中国从价格竞争走向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竞争。

以产业升级和高水平开放应对外部不确定性

——以贸易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

刘青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以下观点整理自刘青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20期）上的发言

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讨论需要建立在两个重要的现实要点之上：一方面，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已经成为研判中国发展的重要变量；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已经高度融入全球化进程。理解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当前的状态以及未来趋势，都需要保持全球化视野和对外部世界的持续关注。

一、贸易高质量发展对中国经济的支撑作用仍将持续

当前，贸易高质量发展对中国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贡献，而且这种贡献预计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未来两三年，中国经济增长仍会与贸易发展有较强联系，背后的大背景是中国供给能力越来越强，而内需的全面启动仍需要一定时间。

从数据看，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3.8%，规模创历史新高，净出口对GDP增长拉动约1.6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2.7%，支撑作用非常突出。贸易相关产业链就业人数基本占到我国总就业人口的四分之一，约为1.9亿人。这些数据说明，贸易不仅关系到增长，也关系到产业链和就业稳定。

今年1—4月，中国外贸情况仍然较好，进出口增速达到两位数，规模继续处于历史高位。贸易对经济的重要性之所以还会持续，关键在于供给端和需求端的状态：供给端很强，而且会持续较强，主要体现为：中国制造业规模大、升级快。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约占国内GDP的四分之一，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约为30%。与此同时，产业升级速度很快，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都有较好发展。我国人工智能技术进步速度和应用热情在全球范围内都属于较高水平，中国工业机器人年度安装量和存量均已超过全球的一半，这反映出中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正在加速。但相反，需求端特别是国内消费和投资，还处在进一步启

动和修复过程中。因此，这种结构性特征决定了贸易作为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状况将持续一段时间。

但我国当前出口对经济的持续支撑并不是对旧模式的依赖，也不是单纯依靠低价竞争，而是产业升级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自然表现，是依靠高质量供给创造国际市场空间。这是理解当前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前提。

二、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根源在于产业高质量发展

贸易高质量发展不仅是贸易环节本身的改善，其真正底层原因是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全球竞争力稳步提升。中国产业发展的重要特点，一是持续升级、全球竞争力稳步提升；二是系统工程能力和产业链配套能力很强，这是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产业竞争力是贸易竞争力的根基，尤其在全球贸易环境不确定、其他国家贸易竞争力相对乏力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的厚度和高度更加凸显。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厚度体现在产业链完整性上。产业门类齐全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许多产业从上游原材料到中间核心零部件，再到下游终端产品，各个环节都有较强企业和竞争力。这种全链条能力使中国在外部冲击中具有更强的抗压能力。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高度核心体现在结构升级上。当前中国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中，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新三样”等领域都是突出亮点，并且保持较快增长。正是中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中国经济提供了稳定性，也提高了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

正是中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确定性，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抗外部风险能力；同时，也为外部世界的发展提供了确定性，一是贡献了很高比例的全球经济增长，二是稳定和提升了全球供应链。在高度不确定的全球环境中，中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成为内外两个层面为数不多的确定性。

从国内角度看，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的稳定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无论从产出还是投资看，新兴产业的增长都明显快于传统产业，这为中国经济未来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稳定基础。从对外角度看，中国产业竞争力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确定性。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的较高水平，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超过30%。在疫情、地缘

政治冲突以及供应链波动等复杂环境下，中国产业链为全球产业链提供了可预期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三、外部不确定性既带来冲击，也倒逼产业升级

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反过来又在影响中国的产业高质量发展，这种影响是双面的，既有损害效应，也有倒逼效应，需要辩证地看，在应对上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正确认识这一辩证关系，是正确把握应对外部世界不确定性的关键。

当前外部环境最大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地缘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和市场准入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会从两个维度影响中国贸易和产业发展：一方面有损中国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倒逼中国产业提质升级、凤凰涅槃。

损害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贸易壁垒会导致订单流失和市场份额收缩，中美贸易占比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就与此有关。第二，全球不确定性推动供应链重组，部分产业从中国外迁，未来全球生产本地化会成为一个重要趋势。第三，技术封锁加剧，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各国都希望抓住发展机遇，技术竞争和技术封锁很难在短期内缓解。

但反过来看，外部压力也在倒逼中国产业加快升级。中国在许多产业链上已经出现换道超车的可能，科技创新和自主突破明显加快。比如半导体领域，华为提出的“韬定律”引发广泛讨论，显示出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通过系统能力实现突破的潜力。

外部压力还推动了产业链韧性和系统性的增强。一个重要体现是中间品出口增长较快。中国越来越多地向全球出口中间品，这些中间品的技术水平、技术含量以及在供应链中的位置都在不断提升。这种变化既与外部压力有关，也反映出中国产业升级正在向全球价值链更高位置延伸。

四、以科技创新、区域合作和制度型开放提升应对能力

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条件下，贸易高质量发展仍面临一系列挑战。

除贸易保护主义外，比较突出的风险包括核心技术依赖和“卡脖子”风险。当前科技革命进展很快，中国绝不能错失新一轮技术机遇；同时，铁矿石、铜、石油等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部分超过70%，这也会形成外部风险敞口。

企业出海合规风险需要重点关注。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企业出海是大势所趋。每次科技革命都会带来全球产业链重组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重塑，中国在新科技革命中的进展较快，制造业基础和规模优势明显，有能力通过产业链转移和企业出海参与重塑全球产业链格局。但在地缘政治环境复杂的情况下，出海企业必须充分重视合规风险，主要包括：贸易救济和原产地合规风险、出口管制和制裁风险、数据跨境和隐私保护风险、ESG 合规风险、投资审查风险，以及不同国家法律传统差异和不同贸易协定带来的制度落差等。中国企业走出去，不能只看市场空间，也要具备适应不同规则体系的能力。

此外，全球经济一体化水平持续走低，国际经贸规则秩序碎片化越来越明显。全球贸易占全球 GDP 的比重自2008年、2009年后持续下降，这也是未来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

应对这些挑战，首先要强化科技创新，着力突破卡脖子技术风险。在开放政策设计中，要坚持“技术进步型开放”原则，始终考虑开放政策对中国技术进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趋利避害。

其次，在区域合作方面，除拓展多元化市场外，还要高度重视亚洲贸易中心建设。当前全球产业链中心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亚洲，中国应在亚洲区域合作和产业链重构中发挥更大作用。

再次，要推进制度型开放，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已经取得较快进展，未来还应进一步通过制度创新提升要素跨境流动效率和企业贸易便利化水平。

最后，要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和规则制定能力。除了参与改造既有规则外，更重要的是在新形势下主动参与新规则、新机构的发起和建设。例如世界数据组织在北京设立，就是中国提升新规则制定能力的重要实践。

总之，面对外部挑战，中国应以更强的技术实力、更完整的产业链和更开放的全球合作，在充满变数的世界中行稳致远。

以科技与产业融合提升外贸竞争力，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以贸易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

丁爽 渣打银行大中华及北亚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丁爽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20期）上的发言

近期中国外贸表现总体好于预期。过去一年多，尽管外部不确定性较多，中国出口和进口表现多次好于市场预测。与外需相比，提振内需仍面临更大挑战，因此有必要从近期走势、外部风险和政策应对三个方面理解外贸高质量发展。

一、近期外贸韧性较强，AI超级周期和绿色转型成为重要支撑

今年1—4月，中国出口和进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以美元计价，出口增长14.5%，进口增长23.6%，进口增速超过出口增速；贸易顺差达到3480亿美元，虽然较去年同期略低，但仍处于较高水平。上述数据表明，中国外贸仍然具有较强韧性。

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超级周期，是近期贸易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一周期不仅影响出口，也影响进口；不仅体现在贸易数量上，也体现在价格变化上。4月份，计算机和集成电路出口分别增长47%和99%，集成电路出口价格也明显上升，反映出相关产品供不应求的状态。从进口看，计算机和集成电路进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说明中国深度嵌入东亚乃至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链，与周边经济体同样亮眼的贸易数据一同体现出超级周期的巨大影响。从出口结构看，中国“新三样”出口继续保持强势，可再生能源、绿色发展相关产品仍具备较强竞争力。相比之下，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家电出口增速相对平稳，说明中国出口增长动能正在从传统低成本产品，进一步转向技术含量更高、产业链更复杂的领域。

美伊冲突及由此引发的能源价格变化，已经对进出口产生一定影响。一方面，油价上升推高了相关进口价格；另一方面，能源供应不确定性也影响了部分产品的进出口数量。4月份，成品油出口环比和同比均明显下降，原油进口和成品油进口也出现两位数下滑；同时，中国从俄罗斯、加拿大等国的能源进口额快速增长，进口来源日益多元化。这都说明着地缘政治冲击已经通过能源渠道传导至贸易端。

从贸易伙伴看，中国出口市场仍然较为广泛。4月份，中国对美出口出现转正，同比增长约11%，从美国进口也连续两个月增长，4月份同比增长约9%。这表明去年10月底中美元首会晤后，双边贸易有修复的迹象。更长期看，中国在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上已经具备较强优势。根据相关测算，2025年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AI相关产品出口国，相关产品出口占中国整体出口的比重约为19%。中国在中低端集成电路、算力基础设施、硬件制造、电力供应以及应用场景方面具有较完整的产业链优势，这些优势还会继续支撑外贸表现。

绿色转型同样是中国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中国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的比重在2025年达到21.7%，较2005年约7%的水平大幅提高。“十五五”期间，中国仍将继续推动能源结构转型。中东局势变化可能促使欧洲、东南亚等地区重新加快绿色发展议程，中国在新能源设备、储能、可再生能源产业链等领域的比较优势有望进一步体现。

需要注意的是，近期外贸数据强劲也包含价格因素。油价、铜价以及集成电路价格均出现较快反弹，特别是进口价格上涨，是进口增速高于出口增速的重要原因。剔除价格因素后，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预计仍会形成正向贡献，但价格变化会影响对贸易真实动能的判断。

二、保护主义风险上升，中欧贸易摩擦值得重点关注

就外部风险而言，中美贸易关系目前相对平稳。中美元首会晤后，双方贸易休战可能延续一段时间。中国可能增加农产品、航空发动机以及能源等方面进口，对等关税调整也有助于恢复部分对美出口。同时，美国部分关税措施面临法律约束，此前部分通过转口形式实现的贸易，可能重新表现为中美直接贸易数据。

但在中美贸易阶段性缓和的同时，中欧贸易矛盾正在上升。一方面，中国对欧洲出口增长，而欧洲对中国出口相对偏弱，中欧贸易不平衡有所扩大；另一方面，中国和欧洲在汽车和高端设备等领域的产品重叠度较高，竞争压力上升。近期欧洲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并在钢铁等产品上采取反倾销措施，相关风险还可能继续扩散。

欧洲正在强化自身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工具。其产业政策强调本地含量规则和“购买欧洲”导向，涉及钢铁、电池、汽车、光伏、风能等战略性行业；同时，欧洲也在外商直接投资审查、国际采购工具、外国补贴规则以及网络安全规则等方面采取更严格措施。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

因此，未来中国面临的贸易保护主义风险不只来自美国，也可能来自欧洲以及部分新兴经济体。随着中国出口产品技术水平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贸易摩擦的对象和领域都会更加多元化。这要求中国在保持出口竞争力的同时，更加重视贸易平衡、规则协调和合规能力建设。

三、以竞争力提升、贸易平衡和汇率政策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

“十五五”规划关于外贸的论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其中一个突出变化，是强调建设贸易强国，推进进出口平衡发展。这意味着外贸发展不仅要增强出口竞争力，也要更加重视进口扩大和贸易结构平衡。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而言，长期依赖外需支撑增长并不可持续，外贸高质量发展必须与国内经济平衡相结合。

服务贸易也应成为未来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过去谈贸易时，人们往往更多关注商品贸易；但“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鼓励服务出口，增强运输、旅行等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并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有所缩小，部分服务出口竞争力正在增强，但这一领域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从中长期看，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和外贸顺差仍会保持较大规模。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将继续强调科技投入、科技自立以及科技和产业融合。科技与产业结合能够形成新的外贸竞争力，推动中国制造业向高端迈进。高质量外贸不应再依靠低价竞争和薄利多销，而应更多依靠技术、供应链能力和外部市场黏性。

政策上，可以从财政和汇率两方面推动贸易更加平衡。财政方面，部分产品的补贴和出口退税可以逐步缩小范围，一方面有助于减少对外贸易摩擦，另一方面也能推动企业从低价竞争转向技术和质量竞争。汇率方面，在基本面支持下，可以允许人民币呈现温和升值。人民币温和升值有助于减少外部贸易矛盾，也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国际机构评估显示，近年来人民币实际汇率存在一定低估，这既反映中国对外竞争力增强，也与国内低通胀和海外高通胀有关。只要经常账户顺差保持在较高水平，人民币汇率就具备一定升值基础。

当然，汇率调整必须以基本面为前提。人民币保持相对强势，一方面能够提高中国企业和居民对外配置资产的购买力，另一方面也能增强人民币资产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最终，

外贸高质量发展既要提升出口竞争力，也要通过进口扩大、服务贸易发展、财政政策调整和汇率机制完善，推动中国经济形成更加平衡的开放格局。

从全球价值链看中国贸易韧性的微观基础

——以贸易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程实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20期）上的发言

过去一年多，中国贸易持续呈现“超预期”表现。很多金融机构和首席经济学家对中国贸易的预测都曾低估实际结果，而且这种低估持续了较长时间。事实不断修正模型和判断基准，但新的事实仍然继续超预期。这提示我们，在贸易量的变化之外，中国贸易可能正在发生更深层次的质变。

要理解这种变化，不能只看出口规模和宏观变量，还需要从全球价值链视角观察中国贸易的新变化。中国贸易韧性的背后，是结构、能力和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换言之，中国贸易之所以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全球环境中保持韧性，关键在于过去十多年久久为功的能力建设。

一、全球贸易路径越来越难以绕开中国

全球贸易秩序正在发生重要变化，但中国贸易表现持续亮眼。从全球价值链角度看，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球贸易路径越来越难以绕开中国。其他国家在动荡环境下做生意时，会发现最优贸易路径选择往往仍绕不开中国，这是中国贸易韧性的重要来源。

基于亚洲开发银行相关基础数据测算可以看到，中国作为全球供给中心的结构性角色正在持续增强。在全球生产分工网络和价值流动中，中国已经成为连接最为密集的出口节点，稳居全球出口中心度首位。中国出口创造的增加值，正通过高度密集的网络路径广泛嵌入全球各地生产函数。

中国当前贸易量上的表现，源自过去十多年基础能力建设的积累。中国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广泛贸易联系，持续增强了自身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枢纽地位。从全球价值链网络看，中国在全球生产供给中心中的角色不断扩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和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都在上升。这说明，中美关系不仅关系两国贸易，也关系全球贸易体系稳定。

中美两国对全球贸易具有“双核稳定”作用，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双边层面，也体现在全球离不开中美稳定作用这一基本事实上。

中国也正在成为难以替代的超级“路由器”。从不同国家在全球生产路径上的不可替代性以及全球重要贸易枢纽的关联程度看，中国呈现出明显的全能型中枢角色。与其他重要经济体相比，中美两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核心稳定作用更加突出。

同时，中国出海正从“产品出海”走向“跨国建链”。第一阶段是产品出海，把产品卖出去；第二阶段是产能出海，把工厂建出去；第三阶段则是生态出海，把中国一整套供应链向外延伸。这意味着，中国正在通过更加深度的供应链延伸，与贸易伙伴分享扩链利益，并进一步增强全球贸易网络中的枢纽角色。

概括来看，中国贸易路径难以被绕开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出口中心度全球领先，增加值输出网络高度密集，中国生产广泛嵌入各国生产函数。第二，结构依存度较高，产业链全谱系优势使绕开中国的机会成本很大。第三，核心关联度位居全球前列，跨国建链正在把中国的枢纽优势向外延伸。

二、中国制造持续升链，价值创造空间正在打开

中国贸易韧性的第二个来源，是制造业沿全球价值链持续上移，价值创造空间不断打开。全球价值链不仅体现供应链分工，更体现利益分配和增加值形成。贸易不能只“赚吆喝”、只追求体量，更要形成影响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当前全球价值链出现“微笑曲线陡峭化”的新变化。也就是说，价值链不同位置之间的收益差异正在扩大，越位于微笑曲线两端，在价值链中的获利能力、话语权和影响力就越强。因此，看贸易不能只看规模，更要看能力、地位和影响力。

从实证测算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正在改善。通过测算衡量一国在上游中间品供给端与下游加工端相对强度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我们发现2017年至2024年，中国相关指数从0.85升至0.98。这说明中国正在从过去偏重加工装配的状态，逐步转向更具持续影响力和盈利能力的位置。

从细分行业看，中高端制造业已经成为中国出口价值的核心载体，出口结构“含新量”持续提升。电气光学设备是中国增加值创造能力最强的出口行业，其规模远超其他行业。高技术产品正在加速引领中国外贸增长。进口侧也体现出结构性特征。电气光学设备深度嵌入全球分工网络，进口集中度和依赖度也较高；精炼燃料、采矿等能源产品则具有地缘冲击型脆弱性，是外部冲击向国内传导的重要渠道。这种结构性分析既能看到中国贸易韧性的来源，也能识别脆弱性所在。

价值链攀升正在把中国的规模优势转化为价值优势。中国制造正从加工装配端向中间核心产品供给端转型，从规模创造逐步转向价值获取。电气光学设备等高附加值中上游制造业规模全球领先，竞争力突出。

外部压力也在加速本土化替代和高端制造跃升。面对外部冲击，中国通过价值链持续上升和产业能力持续增强来提升贸易韧性。这是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实现破局的重要方向。

三、政策重点应从贸易规模转向微观竞争力和价值链攀升

中国贸易韧性更多源自过去十年微观能力建设，而不是某个短期宏观环境变化。中国是贸易强国，但这种强更多体现在微观层面，体现在中国企业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两个链条上的向上攀升，以及全球话语权和影响力增强。

因此，政策不能只从量的角度思考贸易问题，更要从质的角度思考贸易。接下来政策重点应是进一步提升中国贸易在微观层面的竞争力，帮助不同产业企业在全价值链上持续向上攀升。这比单纯追求出口规模更加重要，也更能支撑贸易长期韧性。

一方面，要强化中高端制造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对于已经具备全球竞争力、位于价值链上升通道中的行业，应继续支持其研发、标准、品牌和供应链组织能力提升，使其从规模优势进一步转向价值优势。

另一方面，要对外部冲击的脆弱环节进行精准补强。能源、资源以及部分关键中间品仍然是外部冲击的重要传导渠道，需要通过进口来源多元化、战略储备、供应链安全建设以及技术替代来降低风险。

还要支持中国企业从产品出海、产能出海走向生态出海。跨国建链不仅是企业全球化布局，也是中国贸易枢纽优势向外延伸的重要方式。通过与贸易伙伴共同建设供应链和产业生态，中国贸易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形成稳定性和影响力。

总结来看，中国贸易的超预期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全球价值链中地位变化、产业能力提升和企业微观竞争力增强的结果。未来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关键不在于简单扩大贸易量，而在于持续提升价值创造能力、全球网络影响力和产业链韧性。只有沿着全球价值链持续向上，中国贸易才能真正行稳致远。



把脉中国经济 传递中国声音
Taking Economic Pulse, Forecasting Economic Future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中国人民大学立德楼1105
Add: 1105, Lide Build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59 Zhongguancun Street,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PR.China

网站: <http://ier.ruc.edu.cn/>

微信公众号:



更多免费行业报告

并购家

www.ipoipo.cn